

目录 contents

温州史志

WENZHOU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2年第3期
(总第140期)

■ 资政专栏

- 03 全力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
——2021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核心决策聚焦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党史研究

- 14 温州：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先发地 吴焕根
24 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历程
和历史功绩 郑昌儒

■ 志鉴交流

- 33 《温州抗疫志》编纂的实践与探索 厉靖 吴慧
37 浅谈村志编修的实践与思考
——以温州市村志编修试点工作为例 康丽跃
44 文成县村志编纂工作经验交流 雷晓敏
48 浅谈县（市、区）修志工作中的若干关键
要项的把控 周田田

■ 史志释读

- 54 戴栩与《江山胜概楼记》和《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
张声和
64 从泰顺古籍《之官纪行》看宋代官员差旅文化
陶洪宇

目录 contents

■ 历史人文

- 69 隐藏在泰顺方言深处的历史记忆 陶汉心
75 记冯增荣同志峥嵘曲折的人生 安邦

■ 革命人物

- 82 浙南农民“老大哥”——叶廷鹏传略
87 铁军将才——朱程传略

■ 志说温州

- 93 “柑儿文”是什么文? 金益丰
95 瓯居海中 瓯容四海
温州市瓯海区地方志研究室

■ 诗意温州

- 98 赵师秀《约客》赏析 饶晟吉

封二：图片报道
封三：书法作品
封底篆刻：蓝潮

温州史志

2022年第3期
(总第140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任：王文胜
副主任：魏仕阔 钟体琪 吴华
张声和 张致光
委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厉靖 陈好 康丽跃
金默
主编：王文胜
执行主编：吴华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陈静 李亮
校对：杨建明

地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话：88968780

传真：88968777

E mail: wzds@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2年9月

刊号：浙内资准字第C044号

印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声明：除作者另有声明，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来稿文责自负，因原稿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本刊不负连带责任。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已许可本刊进行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全力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

——2021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核心决策聚焦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温州由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伴改革而强。可以说，改革是温州发展的“基因密码”。2021年，浙江全面吹响数字化改革号角，开启数字化改革新征程。温州在全省统一部署下，谋“数”而动，精准谋划、精心部署数字化改革，锚定“数”标，全力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以“数”为楫，撬动各领域改革、赋能全方位发展、引领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带动温州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谋“数”而动，吹响数字化改革冲锋号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数字变革加速推进，为我们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2003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曾高瞻远瞩地作出建设“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并将此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浙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部署，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数字浙江”建设，2014年以“四张清单一张网”^①推动政务服务平台建设，2017年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启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并撬动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2020年来以数字化手段助力疫情防控……经过近20年的探索实践，浙江在数字化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2021年，省委审时度势，作出实施数字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并于2月18日以新春第一会的形式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全面部署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加快建设“数字浙江”，

推进全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温州是一座吃改革饭成长起来、因改革而闻名的城市，改革的步伐始终没有停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温州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经济、生活、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步伐不断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跃居全省第二位。然而，温州数字化发展的集成性、引领性、突破性内容并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唯有引领数字化改革，温州发展才能走在时代前列。省委号令即出，温州动若风发。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召开后，市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于2月24日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进行梳理研究，提出全力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总目标。市政府亦迅速响应，于3月1日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作研究部署，要求争先创优、打造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温州还统一组织“开展一次集中学习、开展一次工作对接、开展一次家底排摸、开展一次业务梳理、提好一批工作建议”。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于3月25日召开全市数字化改革大会，发布《温州市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全面部署推进全市

数字化改革工作，正式吹响温州全域数字化改革的冲锋号。会议着眼全市“勇争先、强执行、开新局”大局，提出温州数字化改革的主要目标：锚定数字化改革先行市总目标，把数字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按照“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的要求，以重大任务和年度目标为切入点，以破解问题为工作导向，以“梳理业务链、建立数据链、贯通执行链”为主线，构建整体智治体系，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瓶颈，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全力打造数字党政智治区、数字服务标杆区、数字经济领跑区、数字生活引领区、数字治理示范区。其后，温州又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市委专题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及数字化改革工作部署会、座谈会、推进会、现场观摩会等，根据全局性重点工作、阶段性重点工作对全市数字化改革工作进行全方位谋划部署，确保数字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锚定“数”标，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

自全省数字化改革启动以后，

全市上下对标全省“152”框架体系^②，锚定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市总目标，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市县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合作，全力以赴抢开局，质效并举抓推进，高质量、创造性全域推进温州数字化改革工作，并将数字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全面打响全域数字化改革攻坚战。一是统筹领导、整体推进，做好顶层设计。市委、市政府成立数字化改革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领导全市数字化改革工作。构建“1+5”的组织架构（即一体化智能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组和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组、数字政府组、数字经济组、数字社会组、数字法治组），实体化专班运作，积极有序推进专组建、方案编制、项目谋划等工作，形成了《温州市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同时，坚持每周一例会、每日一对接，建立项目审查、专班运行等机制，清单化梳理、节点化推进119项数字化改革重点任务。二是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凝聚最大合力。市委、市政府统揽全局，全市12个县（市、区）全上跑道、全速竞跑、全力领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民企、社会团体、基层组织等纷纷积

极投入改革大潮，成立领导小组、出台改革方案、推出改革举措、打造改革成果，蹄疾步稳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数字化改革谋划实施，全面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一）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

紧紧围绕数字化改革总目标，全面对标“152”框架体系，深入对接全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迭代升级市级公共数据平台和“城市大脑”，全力建设“四横四纵”八大体系^③和“浙里办”“浙政钉”两个终端，按照“全市一体、统分结合、以用促建、经济适用、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健壮稳定、集约高效、安全可靠、开放兼容的温州“平台+大脑”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全面服务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委、群团、社会组织、公共企事业单位等改革主体，有效支撑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全领域改革。

温州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持续迭代，至2021年底归集共享140亿条数据，汇聚27万路视频，综合考评居全省设区市第二位，特别是“市县统建”做法在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

上作典型发言。“浙里办”集成145个惠企利民应用，“浙政钉”集成161个钉应用，还建成全市统一的“组件超市”，累计上架87个智能组件。此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率提升38%，全年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有力支撑全市数字化改革行稳致远。

（二）推进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建设，打造数字党政智治区

聚焦党政机关，围绕市域治理现代化，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服务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主线，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方法和数字化手段，推进党政机关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改革，在全面梳理党政机关核心业务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数字化转型成果，建设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着力打造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服务“一网通办”、监督“一览无余”等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构建综合集成、协同高效、闭环管理的工作运行机制，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在“制度”“治理”“智慧”三个维度纵深推进，开创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新格局。

温州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考评居全省设区市第二。

网络生态“数治通”应用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小微权力“一网监督”应用在温州、湖州全部19个县（市、区）4851个村（社）推广应用，“为侨服务全球通”被纳入全省统战系统重点应用培育项目、全省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并获省委书记袁家军点赞，成为“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典型案例。党政机关核心业务数字化改革超40%，以“七张问题清单”^④应用为关键抓手，“抓党建带全局”乘数效应进一步强化。

（三）深化数字政府系统建设，打造数字服务标杆区

聚焦数字政府，围绕“管”和“服”，立足企业群众的政务服务需求和办事获得感、满意度，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政府治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推进“一网通办”“一网通管”，构建整体高效的政府运行体系、优质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公平公正的执法监管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

温州整体数字服务管理能力显著提升，综合考评进入数字政府系统领跑榜。全年累计打造浙里“新市民”、不动产智治等5个省级试点应用，其中海上综合智治、招商云应

用获评全省数字政府系统“最佳应用”。社会审计报告“一库一码”监管应用、医保信用监管应用分别获财政部、国家医保局批示肯定并要求复制推广。全年网上办件量达1241.64万件，一网通办率达96.41%，成功争取“一网统管”省级试点，“一网通办”“一网统管”逐渐成为新常态。

（四）深化数字经济系统建设，打造数字经济领跑区

聚焦数字经济，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培育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建立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产业大脑为支撑，以“未来工厂”、资源要素、数字贸易等为引领，实现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和经济社会高效协同，形成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数字经济运行系统，推动公共基础数据、生产要素数据、科技创新数据、消费服务数据、贸易流通数据、供应链数据的融合应用，建成一批具有温州辨识度的应用场景，打造数字经济领跑区。

温州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能蝶变综合考评获评2021年度全省优秀。瑞安市承接建设的浙里产业链检测应用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

应用”，科企通、金融服务等应用获评全省数字经济系统优秀地方特色应用，智能电气产业大脑获评优秀等次，正泰“未来工厂”在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瑞立、瑞浦入围省级“未来工厂”试点；制鞋、智能电气、汽车及零部件、泵阀、印刷包装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入选省级新智造试点，电气产业集群入选先进制造业“国家梯队”。

（五）推进数字社会系统建设，打造数字生活引领区

聚焦数字社会，以城市大脑为支撑，以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围绕社会事业十二大领域，打造一批跨部门多业务协同应用，在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等综合场景中先行试点突破，为社会空间所有人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多样、均等、便捷的社会服务，为社会治理者提供系统、及时、高效的管理支撑，发挥“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双功能作用，让城市和乡村变得更安全、更智能、更美好、更有温度，助力温州“生态宜居幸福城”建设，打造全省领先的数字生活引领区。

温州数字社会硬核应用惠及百姓民生，群众改革获得感、满意率显著提升，助力温州蝉联“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20个省级重大应用实现全贯通，44个服务应用上线“浙里办”。乐清市困难群众一件事应用获评全省数字社会系统“最佳应用”，并获民政部社会救助创新实践优秀案例第一名。用血直免、未来康养智城、智汇惠童等应用入选全省数字社会案例集，17个未来社区和10个未来乡村上线“浙里办”“我的家园”。“温州医保信用数字监管”应用入选省医保系统“一地创新、全省共享”项目和全省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S1”。

（六）推进数字法治系统建设，打造数字治理示范区

聚焦数字法治，围绕数字法治系统建设总框架，结合实施《法治浙江建设规划（2021—2025）》和《浙江省政法智能化发展“十四五”规划》，以数字化改革撬动法治建设领域各方面改革，综合集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社会主义法治全过程，在政法一体化办案体系、综合行政执法体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建设中率先突破，在全省“1338”^⑤建设方案的基础上，构建富有温州区域特色的数字法治系统，同步推进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推动法治建设重要领域

体制机制、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的系统性重塑，为深化法治温州建设，打造法治中国示范区发挥重要的引领、撬动和支撑作用。

温州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建设，11个场景入选全省数字法治“一本账”。在省委政法委开展的市县两级数字法治综合应用的运行考核中，温州获评全省设区市第一，鹿城、乐清、瑞安、文成居全省县（市、区）前四。“追风捕影”涉稳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应用、瓯海区行政机关合同管理一体化（涉公合同精密智控）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数量居全省设区市第一。此外，还成功举办首届温州市数字法治场景应用大赛，获得省里点赞。

三、以“数”为楫，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2021年是数字化改革元年，温州全市上下以奋楫者姿态在数字化改革“新蓝海”上勇立潮头、劈波斩浪，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全省数字化改革大跑道上跑出了“温州加速度”，为温州“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赋能加码。

（一）数字化改革交出高分报表。温州“1+5”综合门户全面贯通、核心指标全面完成、省市重大应用发挥实效，在全省数字化改革工作例会上作典型发言4次，数量居全省设区市第一；打造了海上综合智治、利民补助“一键达”等一批标志性多跨场景应用和理论、制度“硬核”成果，其中4个应用入选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数量居全省设区市第二；参与省级部门协同建设的“产业链监测”“浙里营商”应用也跻身“全省最佳”之列。推出全市多跨场景重大应用“一本账”，其中基层“法·智”一网通、侨心宝（为侨服务全球通2.0）、温州医保信用数字监管等纳入全省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目录；“浙里人口全域治理”集成应用等11个项目入选全省“一地创新、全省共享”“一本账”50名单，数量居全省第二。此外，“三位一体”智农共富等系列特色应用成果在国家级、省级部门会议或相关媒体上作为典型案例获推介，并亮相全省数字化改革成果展、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

（二）赋能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跨越。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先发地区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温州市数字

经济集聚发展后劲十足，在这场系统性大变革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2021年，温州在全国数字经济百强城市中位列第27位，数字经济综合评价连续多年排名浙江前三；全市经济基本盘稳固夯实，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三）引领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实现迭代跃升。温州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数字党政、数字服务、数字经济、数字生活、数字社会持续催生发展动能、激发社会活力，为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注入了澎湃动能。过去一年，温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85亿元，同比增长7.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7.6亿元，增长9.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9678元和35844元，增长9.8%、10.5%，全市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共同富裕扎实推进。

四、乘“数”而上，续写新时代温州创新史

经过一年的探索和实践，温州

的数字化改革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全省数字化改革贡献了温州素材、温州案例、温州经验、温州力量。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相较于新发展格局的需求，温州的数字化改革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譬如改革品牌影响力仍需提升、改革应用开发仍需发力、改革实战实效仍需提升等。

2022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温州“续写创新史”殷殷嘱托20周年，也是实现数字化改革“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战略目标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为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浙江数字化改革亦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探索创新阶段步入了实战实效、系统重塑、形成能力的新阶段，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锚定“两个先行”奋斗目标作出“高水平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数字变革高地”的战略决策部署。当前，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温州进入了不进则退的紧要关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温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回答好“五个时代命题”^⑥、全面推进“四大振

兴”、奋力实现“六个先行”。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温州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载体，是通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船”和“桥”，是温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核心发力点。实践证明，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温州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的“优选项”。回答新的时代命题、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唯有乘“数”而上，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

一是持续高举改革大旗，永葆改革探路者使命担当。“进入现代化新征程，更要高举改革大旗。”^⑦在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要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关键一招”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数字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弘扬“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精神，始终将改革放在温州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发挥改革探路先行优势，学习借鉴兄弟城市先进经验，迭代升级既有成果，开拓创新争取突破，巩固做强优势领域，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推进数字化改革全面贯通、集成突破，同时以数字化改革贯穿始终、牵引全局，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改

革任务等整体贯通、一体推进，奋力打造敢破善立、示范引领的改革先行区，争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模范生。

二是持续厚植改革基因，增创温州体制机制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敢为天下先”，开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赢得了体制机制先发优势。作为一方体制机制的改革沃土，温州要笃行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上继续走在前列”“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改革新的目标机制，始终聚焦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建立健全覆盖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工作统筹机制，全面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保持韧劲、持续发力，在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中探路先行、争做示范，着力探索体制机制变革重塑的新逻辑、新方法，着力形成迈向现代化引领现代化的新机制、新模式，勇当“两个先行”的开路先锋。

三是持续引领改革发展，创建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实现产业振兴，基础根基是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新飞跃。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

祥地，温州要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主动的姿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充分发挥民营经济这一最大优势，牢固树立制造业立市、强市、兴市、富民理念，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继续做强实体经济，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引领带动、传统产业[®]重塑再造、新兴产业[®]主导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加快重构温州制造业竞争新优势、重树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新标杆，高水平建设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打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四是持续深化改革突破，打造“重要窗口”标志性成果。“实现‘两个先行’，必须充分发挥改革突破和引领作用。”^⑩在“两个先行”的大场景中，更需要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要深化认识数字化改革“一子落满盘活、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战略意义，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抓改革，坚持一体推进与多跨融合相衔接、需求导向与结果导向相匹配、做优应用与做亮特色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共建相结合，突破改革的堵点、难点、痛点，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按照“迭代一批、创新一批、建成一批”的路径，打造一批“体现现实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彰显温州特色”的具有突破性、引领性、标志性的数字化改革成果，确保2022年底全面建成“掌上办事之市”“掌上办公之市”“掌上治理之市”。

五是持续释放改革效能，答好“续写创新史”时代命题。要紧紧抓住数字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将数字化改革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续写创新史”殷殷嘱托紧密结合起来，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数字化改革贯穿于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切实发挥数字化改革的引领性、整体性、撬动性，持续释放数字化改革的效能优势，以数字化改革再创制度优势和发展胜势，加快完善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各领域制度重构、流程再造、系统重塑，赋能产业转型、改革创新、服务提质、市域治理、风险防控，引领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全面助推都市振兴、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做强做大“全省第三极”，当好浙江“两个先行”的开路先锋。

瓯江潮起，“数”造未来。当前，数字化正开启新一轮发展变革，温州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温州“续写创新史”殷殷嘱托20周年为新起点，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数字化改革驱动实现“两个先行”，争当“续写创新史”答卷人、“走好共富路”引路人，加快建设更具活力的“千年商港、幸福温州”。

（执笔：赖晓华、钟体琪、王志愿）

注释：

① “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

② “152”框架体系：“1”即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5”即5个综合应用，分别是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2”即数字化改革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

③ “四横四纵”八大体系：“四纵”即政策制度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组织保障体系、网络安全体系；“四横”即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业务应用体

系。

④ “七张问题清单”是浙江省推出的党建统领问题管控机制，包括当场办理事项清单、网上办理事项清单、承诺办理事项清单、限时办理事项清单、便民化服务事项清单、从严监管事项清单、就近办理事项清单。

⑤ “1338”：“1”是建设1个数字法治综合应用；“3”是完善3项重点任务和相关联的3个集成应用，即政法一体化办案体系、综合行政执法体系、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体系；“8”是提升8个基础应用。

⑥ 回答好“五个时代命题”：回答好如何赓续千年城市文脉、推动城市一体发展、实现品质能级跃升的时代命题，回答好如何重塑港通天下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的温州”、走在新时代开放发展最前沿的时代命题，

回答好如何筑牢实体经济基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振温州经济雄风的时代命题，回答好如何重燃创业创新激情、再造体制机制新优势、为建设“重要窗口”增光添彩的时代命题，回答好如何加快缩小“三大差距”、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打造共同富裕市域样板的时代命题。

⑦ 2022年8月30日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全省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⑧ 五大传统产业：电气、鞋业、泵阀、汽车零部件和服装。

⑨ 五大战略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新材料、智能装备、新能源和生命健康。

⑩ 2022年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十五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温州：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先发地

◇ 吴焕根

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温州人敢为人先，首创“温州模式”，成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党委、政府的许多做法也领全省和全国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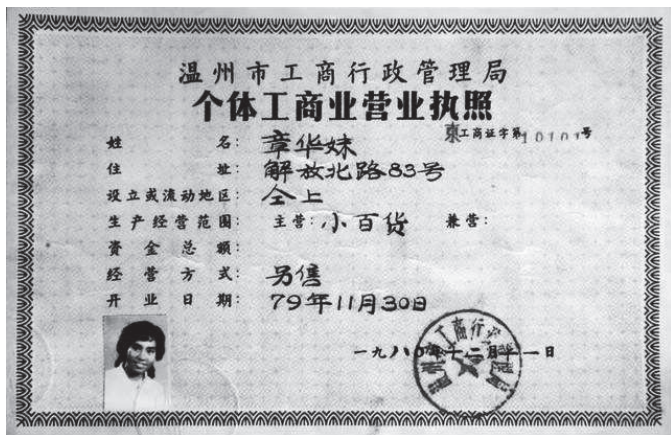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简史》记载：“1979年6月……。浙江温州的章华妹在自家门口支了一张小桌子，摆上针头线脑，成为个体户。1980年，温州成立工商所，章华妹成为温州第一个获得执照的个体户。这张个体户营业执照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第一张。”

本文不论章华妹取得的营业执照是否为改革开放后全国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而是对全国和全省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或第一批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是哪家或哪些企业、在什么地方，进行考证。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严肃的考证，现在的一些志书和相关宣传资料有了不甚准确的说法。

笔者经过考证，认为改革开放

后虽然全国第一张私营企业营业执照不在浙江，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5年4月13日颁发给大连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工商私合字001号。该公司注册资本壹万美元，董事长姜维，有效期10年（至1995年4月12日止）。这是1984年夏天姜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研究私营公司可否成立的会议时，提出要办私营企业后，经国务院特批才颁发的。但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第一批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是在温州。

企业注册登记须有法律政策依据。私营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一般以为是1988年6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第4号国务院令发布、同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样看来，同年6月16日颁发给萧山市微型轴厂的那张私营企业营业执照，是在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



章华妹取得的营业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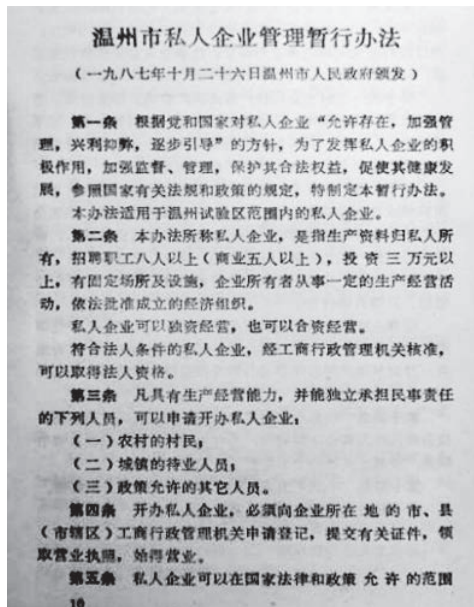
例》出台之前，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全省第一张了。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早在1987年10月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温州市及所属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有关单位发出《关于印发〈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政发〔1987〕85号）。通知指出：《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目前只限在温州试验区范围内试行。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村改革试验区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7〕62号）中指出‘对一些较敏感的试验项目，如土地调整、私人企业等问题，不要作公开的宣传报道’，请在试行中注意掌握。”该《办法》共22条，最后一条为：“本

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今后国家如有新的规定下达，按国家规定执行。”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中央在向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关于私营经济有大段的论述：“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同月26日，温州市人民政府以温政发〔1987〕279号文件转发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1月19日，《温州日报》第2版“为您释



《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首页

疑”栏目刊载了《关于温州私人企业管理引导的若干政策问题的解答》一文，对涉及《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1988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简称《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同月16日，萧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萧山市微型轴厂等20家私营企业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而这之前，温州早已开始了私人（营）企业注册登记工作。《温州市志》记载：“改革初期，全市尚无私营企业。1987年开始登记私营企业共331

家。”1988年累计在册352家，1989年在册1054家，1990年在册1210家。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所称的“私人企业”和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所称的“私营企业”，是同一性质的企业。

《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私人企业，是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招聘职工八人以上（商业五人以上），投资三万元以上，有固定场所及设施，企业所有者从事一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批准成立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对照上述两个条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与“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招聘职工八人以上”与“雇工八人以上”，只是文字稍有差异，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说明《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所称的“私人企业”与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所称的“私营企业”是同一性质的企业。

事实上，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以前，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

地方报道，这两个名称同时在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1月22日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文件）中，第六部分“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私人企业有同公有制经济矛盾的一面，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弊端，主要是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对此，可以通过管理和立法，加以调节和限制。”

第二，《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施过程中，温州私营企业注册登记有起有伏。

《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虽然已在1987年10月下旬，当年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就达331家。第二年，也就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当年，温州市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仅21家，刚刚超过萧山市6月16日首批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其中的原因：一是《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一部分私营企业进行了注册登记，其它个体户也好，想创办企业的人也好，都存在一定的观望心理。二是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颁布实施后，《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需要与之有一个衔接的过程。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政府发出《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温政〔1988〕46号），认为《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与《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国务院的条例、规定在税负、分配、产权等问题的处理上，比我市的暂行办法、规定更加明确、具体和优惠，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市有关私营企业的管理工作，一律应以国务院的有关条例、规定为准。”

随后两年，温州市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注册登记的小高潮。1989年，温州市在册私营企业1054家，比上年增加702家；1990年，在册1210家，比上年增加156家。

第三，温州市最早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在《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办法》出台之后即有大批企业进行注册登记。

从找到的资料看，在《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瑞安县^①已经开始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瑞安市志》：“私营企业登记工作

于1986年恢复，当年登记3户，至1987年发展到6户，1988年增至61户，1989年179户。”《瑞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也有相应记载。

瓯海区最早的私营企业，应该是温州市瓯海无线电元件厂。《温州市龙湾区志》记载：“1985年，永中镇（2001年8月划入龙湾区，现为永中街道）劳务公司所辖‘温州市瓯海无线电元件厂’在上海黄浦区开设50余间经营部，产品批发营销全国各地。”“1986年，无线电元件厂被列入机械工业部定点企业；1987年，该厂成为境域第一家亮牌私营企业。”

除了新设立的私营企业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改登为私营企业外，温州还为“红帽子”企业^②摘帽，使资产为个人所有的企业做到“名实相符”，重新注册登记为私营企业。而温州的私营企业业主，在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并创造良好业绩的同时，还与温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一起，参与了国家有关私营企业管理的立法工作。

可以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大连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工商私合字001号，是特例；而温州的做法（不含瑞安县1986年给私营企业登

记）是以省政府的名义出台地方政府规章——《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然后实施，则具有普遍意义。与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一样，在民营企业注册登记上，走的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实施（试点）—总结经验—立法—正式实施”的改革开放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正确的，即使在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的今天，也是可以复制和继承发扬的。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或商品经济方面，温州会走在前列？主要原因是，温州地少人多，温州人有经商传统，肯吃苦且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他们敢为人先，甩掉思想包袱，勇敢地投身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去，率先突破，率先发展，领全省和全国之先。

在回顾《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和实施的过程时，绕不开当时非常著名且争议很大的“温州模式”和温州试验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有别于发展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注重利用外资的“广东模式”。温州试验区，全称是

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范围涵盖温州市区和下属各县市，虽已成为历史，却不应忘记。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同年12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温州模式研究课题组”。1986年初，课题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组一起到温州开展调查。6月14日至19日，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国务院、浙江省有关部门甚至外省的一些领导都参加了讨论会。对“温州模式”的评价、作用、市场体系等认识比较一致，对所有制结构和雇工经营等争论较大。会后，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发表《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报道上批示：“王芳同志，可支持大胆试验。”

1986年5月8日，中央主要领导在谈到如何解决农村党员中雇工和私人企业的问题时指出：要从中国的实际

出发，考虑农村经济的第二次战略部署问题。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要靠两条：第一，靠地方资金，靠乡镇企业；第二，发挥个体和私人经营者的才能和资金积累，并建议“先在温州试验”。

接到刊载上述内容的《中办通报》后，浙江省和温州市两级党委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5月中旬，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到温州考察，研究建立温州试验区的问题。7月，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祖伦到温州，检查改革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8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初步拟订了试验方案，于23日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有关问题的报告》上报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根据温州的方案，作了多次研究，形成了建立试验区的初步方案，并于9月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在介绍温州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试验的指导思想、试验内容和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解决的几个问题等。试验的首要任务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并提出允许雇工经营，不限制雇工人数等。报告特别指出：“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准备尽快制定《温州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及其他有关规定。”10月，时任省委书记王芳赴京开会，就温州试验区问题请示万里。万里回复：“要积极干起来”。王芳回来后，向温州市委领导传达了万里的指示精神。11月7日，温州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作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的内容，为建立温州试验区统一思想认识，具体部署试验项目的实施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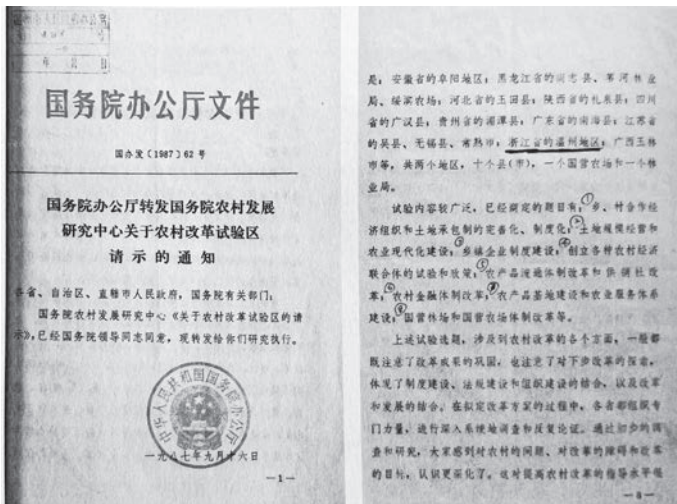
1986年底，我国第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试验区——温州试验区开始运作，试验方案开始实施。1987年2月下发《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提出“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文件指出：“在改革的深入阶段，可以在一个市（地区）、一个县的范围内，按照改革方案进行实际试验，主要目的是，由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章程和法规，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完善化。”“在试验区可以进行综合改革试验，也可以进行某一方面的专项试验；不同的试验区可以有不同的改革方案。”对此，中共浙江省委高度重视。1987年和1988年，省委两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讨论温州试验区的问题。省委指出，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城乡个体、私人

和股份制企业进一步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和管理。

1987年9月11日，新华社发布电讯稿——《我国已建立起温州等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公布了全国第一批14个改革试验区的名单。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村改革试验区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7〕62号）下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请示中提到，试验内容较广泛，已经商定8个方面的题目，其中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创立各种农村经济联合体的试验和政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温州试验区密切相关。同时特别指出，温州试验区涉及面广，浙江省委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已先期提出方案报告党中央、国务院，此次不再重新申报。

大半年前已经开始运作的温州试验区，试验内容更具体，也更切合温州实际，主要有：（一）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二）从调整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入手，加快国营、大集体工商企业的改革；（三）逐步放开价格，建立以市场价格为主体的区域价格体系；（四）改革金融体制，开放资金市场。其中第一项内容中明确，“以法

1987年9月16日，温州市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



律形式保护私营经济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允许雇工经营，不限制雇工人数。有条件的私营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向社会发行股票。……取消对他们的不必要的限制，并且在贷款、税收、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采取鼓励政策。

报道还引用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和市长卢声亮的话：“温州试验区”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的性质，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等，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1987年初，江苏省无锡市经济研究中心、市厂长经理研究会及江阴、宜兴两县经济研究室的人员考察

温州后，在“温州模式”对他们的启示中指出：“温州党政机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敢于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锐意改革，大胆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繁荣农村商品经济而积极引导、周密服务的工作作风，是各地党政机关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市体改办、市政府法制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温州市挂户经营暂行规定》《关于农村股份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三个政策性文件。后两个由温州市政府颁发施行。《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多次征求人

大、政协、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私人企业家的意见，反复修改。

“但由于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营企业，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国家尚无有关这方面的法规，而且温州也没有立法权。因此，有关私营企业的政策、法规，必须经省一级人大和人民政府审核、批准。1987年5月，我们根据中央5号文件和省委书记办公会议的精神，对草案再加修改后，于1987年6月22日，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省人民政府。”20多年后，亲历此事的时任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潘丕良还心有余悸地说：“那个年代存在不少条条框框，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搞得不好就要被‘扣帽子’。我的很多老朋友都觉得我们推动这个计划很‘危险’”。

温州人民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温州市委、市政府锐意改革，温州市及各县（市）党政机关积极引导，加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87年9月，温州成为全国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10月4日，省政府印发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温州市政府进行了转发。这是我国“一化三改造”后第一个关于私

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它将正在发展中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无序引向有序，从有序提升到规范，保护了众多刚刚走上发展道路的温州私营企业，进而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影响甚至波及到国计民生和技术服务行业。1988年初，温州出现了首家私营粮行和首家家庭农技站。1989年初，温州就提出了“民营经济”的概念。而且，温州是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到1989年6月初，已在20家私营（股份）企业建立了党支部。

2018年3月19日，李克强总理签署第69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历时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废止。

注释：

①1987年4月1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县设市，7月1日召开撤县设市大会，即日设立瑞安市。

②“红帽子”企业是指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而又以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或者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的企业，即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

私有制企业。

（作者单位：中共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1. 《温州试验区有关条例汇编》，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1987年11月。

2. 《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

3. 《瑞安市志》，中华书局，2003

年12月第1版。

4. 《温州市龙湾区志》，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版。

5. 《改革开放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

6. 《温州改革开放40年大事记》，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 光辉历程和历史功绩

◇ 郑昌儒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在长征前，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实施战略大转移，早在6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远征，向闽浙赣皖进军，执行牵制任务。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赣皖四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0月下旬，进入赣东北；11月4日，接中革军委电令，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由于先遣队兵力仍然过小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与10倍于己的敌军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重兵包围，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英勇就义，指战员大部牺

牲，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得以突围。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加上原闽浙赣红十三师第一团100余人，共538人，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中央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临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红军挺进师入浙后，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光辉成就，其历史功绩值得永远铭记。

一、实现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部进入闽浙边境以后，为加强对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师政治委员会。

同时将原有3个支队扩编为3个纵队。吸取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失败的教训，挺进师深刻认识到，只有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充分运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通过分散和缩小作战单位的方式，规定干部们单独行动的天数，先出去活动三五天，再会合；再出去活动十天半个月，再会合；逐步培养干部带领小分队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战机进行游击战和宣传组织群众的能力。

粟裕运用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创造了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将其归纳为“六条原则”和“五个要领”。

“六条原则”：一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是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是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是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是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五个要领”：一是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二是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

有小胜；三是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四是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五是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突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这些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不仅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克敌制胜、保存发展自己的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极大丰富了我党我军有关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

二、采取武装斗争和建设根据地相结合的方针，创建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能持久。”他曾指出：“处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遵循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采取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在浙闽边往返作战，先后打了几十仗。1935年5月，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在挺进师和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经过4个多

月的艰苦斗争，创建以松阳安岱后、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刘英、粟裕等领导每到一地，就找群众谈心，做社会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和要求，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红军挺进师政委政治部提出，每个红军指战员每日要写10条标语，要找10个民众谈话。即便到了现在，江山、武义、龙泉、松阳、金华婺城区等市县的一些乡村仍保留着当时红军张贴的标语。

同时，依托团结当地群众领袖陈凤生、卢子敬、陈丹生，争取教育“青帮”群众参加革命。通过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镇压土豪恶霸，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各级党组织和红色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开展了查田量地、分青苗分田地的斗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挺进师有了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补给。粟裕率师部驻遂昌王村口，在松阳安岱后、丁坑和遂昌后塘等地建立后方基地，设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伤病员医疗所，还设立缝纫厂专为红军战士制作过冬棉衣。在这样的环境下，挺进师很快从原先3个纵队发

展到5个纵队近千人，连同地方干部达2000人之多，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千余人。

1935年10月，红军挺进师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师。11月，为协同对敌斗争，双方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经协商决定，刘英任省委书记，粟裕任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闽东特委主动让出有相当工作基础的鼎平地区归临时省委直接领导，并以此为依托向北发展。挺进师和闽东红军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发展了闽浙边的革命形势。

浙南地区是一块革命历史悠久又持续不断的红色热土。早在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就在温州城区建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在浙南大地上掀起大革命的浪潮。1930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红十三军的红旗漫卷温、台、处、婺所属20余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浙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影响深远。1932年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叶廷鹏等在平阳县麻步镇岭门头村组建了中共浙南委

员会，后又成立浙南红军游击队，至1936年上半年逐步建立平阳、瑞安县委和永强区委等基础组织，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区。1936年9月，叶廷鹏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和挺进师会师，并主动提出接受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这使得浙南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展。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建立了有2700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500多人。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参加群众组织的达10万人。仅平阳县就建立青年抗日救亡团2600人，农民抗日自卫队4500人，农会15000人。至此，比较稳固的包括浙南、浙西南和浙东南在内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完成，挺进师游击战争活动的范围到达过闽浙边界两侧、温州、丽水地区、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

粟裕在回顾总结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时说：“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求相对稳定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

些小块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还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反击国民党的大规模“清剿”，牵制和消耗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挺进师进入浙江之后，他们自然坐立不安。1935年7月，《东南日报》载文呼吁：“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区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说，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惊呼：“四分之三的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达20余县，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1935年8月，蒋介石急忙任命卫立煌和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为“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并调集40个团七八万人，向浙西南地区大举进攻。此次进攻一直持

续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重点“清剿”，挺进师果断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浙闽边开展游击战，使基本力量得以保存，后快速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丧失了，但在不长时间里就得到局部的恢复，挺进师力量也随之壮大。粟裕回忆说：“后来实践证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的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对南方各游击根据地加紧部署新的“清剿”。国民党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调集43个团兵力，采取“大拉网式”进逼包围的方针，发动第二次“清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采取“隐蔽骨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

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清剿”，把部队分为突击队和牵制队，相互配合。刘英率领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主要进行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的牵制队，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任务是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保卫基本地区和开辟新的游击区。

粟裕、刘英是挺进师的军政两把手，实际上，他俩也是“军、政一双手”。为什么呢？因为粟裕在1933年5月硝石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前臂的动脉血管和神经，还伤了骨头，只剩下一只右手。而刘英在1934年12月的谭家桥战斗中，右手腕骨被敌人子弹打成粉碎性骨折，只剩下一只左手。所以粟、刘两人配合起来是“一双手”。这是一双非凡的手，领导挺进师打造了一块浙南游击区，而且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36年8月19日，临时省委正在福鼎县李家山开会，得悉敌保安团一个连要来偷袭，粟、刘二人立即决定各带挺进师一部设伏歼敌，取得胜利。红军挺进师在李家山的两棵合抱枫树下召开军民庆功大会，并宣布李家山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宣传员在两棵树干上各刮去一块树皮，请师首长写标语。刘英用左手写下了“打碎旧世

界”，粟裕用右手写下了“建立苏维埃”，全场军民鼓掌喝采，留下永久的纪念。

在两次反“清剿”的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吸引牵制敌人两次几十个团的“清剿”兵力，时间各长达8个月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

四、适时调整党的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因遭敌袭击，通讯器材全部丢失，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就通过收集各种进步书刊和国民党报纸，从中了解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政策。当刘英、粟裕了解到党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后，就立即给指战员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并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我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针对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适时转变和调整党的政策。如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委员会”，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保长由原来镇压为主改为以争取为主等等。同时，注意工商业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政策策略上自觉地实行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

1936年7月，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关文件。在紧张的反“清剿”斗争中，1937年3月，临时省委收到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后，即发出快邮代电，呼吁浙江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速派代表和谈。此举得到了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响应。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临时省委投降，谈判随即破裂。“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要求与临时省委重开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此时正在遂昌门阵活动的粟裕，得知国共两党和谈的消息，即派出代表与遂昌县政府代表进行谈

判，并达成协议。浙江国共两党和谈的成功，标志着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从而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在当时南方各游击区中是比较早的。

刘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达成协议，在温州、丽水、平阳设立3个新四军办事机构，在抗日宣传、统一战线、输送青年干部和物资支援皖南新四军、照顾处理新四军军烈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五、培养造就了一批重要骨干力量，锻炼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战斗队伍

刘英、粟裕都很重视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干部。刘英认为：有了党正确的主张和正确的策略路线，还需要有胆识、有远见、能说能为、能负责的干部作指导。假如没有这样的干部，要独当一面、坚持斗争、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根据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到平阳北港山门集中，这支部队随即在凤林宣布改番号，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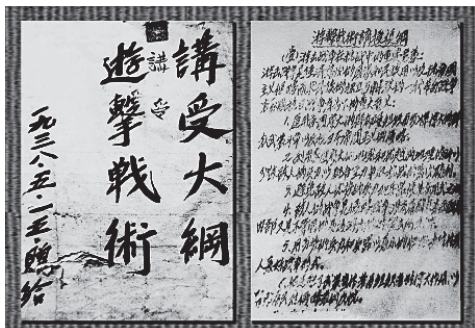
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在等待上级指示期间，为了培训抗日骨干力量，临时省委在凤林、玉青岩、大屯村举办了三期骨干训练班，由支队长和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约50人。刘英、粟裕亲自为干训班讲课。通过培训，学员们进一步明确了抗日形势和任务，从理论上加深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认识。

1938年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山门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招收浙南地区及外地的中学生及少数工人、教师等，共有学员150多人，粟裕任校长，刘英、粟裕亲自上课。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培训后，抽调20多名学员组成“随军服务团”，随军北上抗日。其余学员统一由临时省委分配到全省各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或开辟新区工作，后来大部分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骨干，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粟裕在总结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新形势，编写了《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他认为“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进行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

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提纲》充实了我党我军有关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并较早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显示了这位青年红军将领卓越的军事才能，构建了粟裕军事思想中游击战争理论的基本框架。

1938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山门，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曾山强调，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经商定，粟裕带领部队去皖南，刘英带领一部分干部留下继续领导浙江工作。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领400多人从平阳山门出发赴皖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4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又将新兵队60多名战士送达皖南，总人数约为500人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史称“老三营”。这是一支“两个军团的后代”的部队，原红军挺进师将



粟裕编写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

士不过百人，其余都是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农家子弟和一部分青年学生。这支部队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华中战场的一支荣誉劲旅，战功卓著。

红军挺进师主力北上抗日以后，省委书记刘英率领龙跃、林辉山、吴毓、郑丹甫、郑海啸、张麒麟、谢文清、宣恩金等人，及3个短枪班仍留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以浙南根据地为战略支点，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浙江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曾山评价说“温属的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活跃，在深度与广度上都为东南诸省之冠。”留下的这一批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为抗战初期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奠定了基础。刘英牺牲后，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继续领导浙南基本地区工作，团结英雄的浙南人民将红

军挺进师在浙南点燃的革命烈火延续下去，为解放整个浙南全境作出重要贡献。

六、红军挺进师和根据地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浙南地区广大党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并肩战斗，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达千人以上，纵队以上不到30人的领导干部中就有18人牺牲。中共浙西南特委三任书记宗富平、黄富武、许信焜，第一纵队两任纵队长朱宝芬、王屏，第二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第三纵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第四纵队长王裔三、政委李凡林，第五纵队长刘文生、政委柯勤发等等先后壮烈牺牲。还有无数地方党的优秀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文成县胡从点6兄弟先后参

加挺进师领导的游击队或当地农会，同恶霸地主作斗争，一年内都先后为革命牺牲。粟裕曾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他还回忆说：“在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干部和军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的和有名的革命英雄。”这些革命英雄事迹为我们进行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宝贵丰厚的红色教材。

（作者系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温州抗疫志》编纂的实践与探索

◇ 厉靖 吴慧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影响范围最广、防治难度最大、管控力度最强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初，温州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仅次于湖北武汉、黄冈等地，排全国第五，温州的抗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编纂《温州抗疫志》的目的和初衷就是全面、客观、真实记录温州抗击新冠疫情全过程，大力宣传抗疫成果，系统总结抗疫经验，推动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完善疫情防控机制体制，服务于当前和今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温州抗疫志》共设10章，正文前设彩照、综述、大事记，正文后设附录，80余万字。现将在编纂过程中突出的亮点、遇到的难点和编纂的心得体会做个梳理，为抗疫志的编纂提供温州经验。

一、亮点突出

（一）突出记述市委、市政府面对疫情，沉着应对，体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市领导亲临一线坐阵指挥，迅速成立工作专班，通过“奋战十天，拿下拐点”“再战十天，锁定胜局”“决战十天，力夺双赢”的战略，交出了一份抗疫的高分报表。

（二）突出记述医卫战士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用肩膀撑起市民群众的健康屏障。全市成功救治确诊病例516例，隔离11万余人。驰援湖北武汉，先后派出3批次37名医护人员、8名检验人员支援北京，均实现救治对象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为全国抗疫贡献温州力量。

（三）突出记述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充分体现大爱温州、温暖之城的城市温度。全市2.8万个基层党组织，22.6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职

工，4.2万名抗疫干部和8600余名党员先锋，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

（四）突出记述在外温州人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充分展现新时代温州人的精神风貌。疫情期间，70多万海外温州人同心抗疫，利用遍布世界的网络、资源优势，搭起全球“物流网”，将物资源源不断运回家乡。2月14日，第一条欧亚洲际临时货运航线上的包机搭载90多个温籍侨团、企业及个人捐赠的200多万件防疫物资运抵温州机场。2月16日，温籍华侨在越南、柬埔寨等地采购120万只口罩，搭乘全国首架防疫物资民间募捐货运跨国包机抵达温州。还有很多人通过“人肉”方式（随身行李携带），背回了一箱又一箱防疫物资，其中122件行李的托运单更是造就了“史上最长”的纪录。世界温州人用赤子之心为家乡、为祖国筑起一道爱的“防护墙”，为伟大的抗疫精神增添浓墨重彩的篇章。

（五）突出记述基层干部和志愿者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市民群众构筑起了一张坚固的安全网络。比如“抗疫的脚步”中，讲述了社区防控一线人员“日行三万步，月磨一双鞋”的坚守；再比如“疫情不退、警察不退”中，讲述了公安干警以生命

赴使命，用热血筑警魂等等。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温州涌现无数感动人心的事迹，其中获评全国先进集体1个，先进个人4名，全省先进集体43个、先进个人110名，全市33个先进集体、758名先进个人受表彰，弘扬了新时代温州人的精神风貌。

二、存在的难点

（一）难在“新”。《抗疫志》不是传统的地方志，不是古代的灾异志，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专业志、部门志，是一种新的志种——重大事件志。温州是全国最早启动《抗疫志》编纂的地区之一，《温州抗疫志》作为重大事件志，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二）难在“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事件历时不算长，但横断面复杂，涉及的部门单位和参与人员众多，志稿内容和撰写人员协调难度大。以往的志书，按部门职责去编写，重叠现象不多，操作起来也相对简单，但《抗疫志》一个章节可能会涉及到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单位，如何在格式、体例、内容上做到统一规范，难度不小。重复交叉的问题会在合稿阶段更为突出。

（三）难在“专”。传染病防

控和公共卫生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和术语，同时抗疫工作的政策性专业性比较强，相关工作资料存在涉密风险，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把关，避免出现专业性、政治性的错误，尤其到了最后核稿阶段，仍需加强审核把关，保证编纂质量。

（四）难在“止”。新冠疫情至今仍未结束，如何确定《抗疫志》的下限成了难题。断限若被突破，则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会让抗疫志的记述重点产生偏移，新的局面、新的问题催生新的记述重点。如疫苗接种、常态化防控等内容，在纲目设计之初，没留篇幅。目前初步设想的时限限于2020年6月末（个别数据稍延）温州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阶段。重要事件下延至2020年12月，重点记录该时限范围内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三、主要体会

（一）要主动争取领导重视。2020年2月初，温州抗疫斗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温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就敏锐意识到，要为这一重大事件编志是方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向市领导汇报开展

《抗疫志》编纂计划，主动超前谋划编纂《抗疫志》，争取《抗疫志》立项，并获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伟俊指示，要通过《抗疫志》的编纂，让温州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精神和新时代温州人精神在全社会深入人心、薪火相传。2020年5月25日，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抗疫志》编纂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秘书长担任组长，副市长任副组长。

（二）要细致深入开展调研。面对这个全新的课题，做好框架设计工作，以更加全面、系统、专业的视角来展示温州人的抗疫全貌是编纂《抗疫志》工作的关键点。抗疫还在进行中，市志办主动与市防控办对接，收集抗疫工作开展以来市防控办发布的通告与通知，细致梳理每个文件，形成抗疫工作基本组织框架和时序脉络。同时，到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等10多家抗疫重点单位开展调研，面对面交流，得到各部门的鼎力支持。在抗疫工作还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市志办就已经启动资料收集工作，保障了资料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全面性。此外，还向全市200多家单位发送纲目征求意见函，根据相应的反馈修改稿件，完善志稿框架设计并最终形

成编纂方案。

（三）要谋划到位组织有力。2020年5月底，《抗疫志》编纂工作启动大会召开，志稿承编单位分管领导共100余人参加会议，按照编纂方案领取编纂任务。市防控办专门安排一位熟悉全面工作的同志配合市志办工作，各承编单位指定专人负责联络，选配好主笔、主撰，集中时间，重点攻坚。市志办加强对接，做好分类指导、协调服务以及总纂工作。为提升撰稿人员志稿编写水平，组织105家承编单位的300多名撰稿人员进行志稿编写培训，并提供样稿模板，使其迅速

掌握志稿的编写方法，确保编纂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四）要编纂保障措施到位。《温州抗疫志》编纂工作得到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编纂必需的人力和财力保障。市委办将《温州抗疫志》编纂列入全市年度工作重点，加强了顶层设计安排；新增临时编辑3名，增强了编纂队伍力量；财政部门为《温州抗疫志》编纂和出版特批充足的经费，有力保障了编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温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浅谈村志编修的实践与思考

——以温州市村志编修试点工作为例

◇ 康丽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国各地乡村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如何记录好这一变化，无疑是方志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村志的编纂，历来有之。在古代，村志大多属于私修。新中国成立后，两轮修志工作并未将村志列入志书必修范围，但各级地方志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开展村志编修工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要重视乡镇村志编纂工作。2016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地方志工作要向基层推进。2019年11月7日，在温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市长、委员会主任姚高员就指出，在全市各级地方志机构全面完成二轮修志工作，要积极推动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及行政村开展志书编修工作，从而全面推

动温州地方志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央、省、市都对村志编修提出相关要求，可见村志编修工作是未来地方志工作的延伸地带，是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的一个支点，这既是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也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温州市志办在充分探讨村志编修的必要性和村村有志的可能性后，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动村志编修工作，并于2020年末从探索村志编修的经验与做法的角度出发，在文成县两个镇开展试点工作。

一、开展村志编修的必要性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开展村志编修除了发挥地方志自带的存史、资政、育人等基本功能外，还在抢救乡村文化，规划乡村发展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村志编修是延续志书编修

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行政村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是最基层的区域单位。村志编修是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诠释，也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延续。

（二）村志编修是记载地域文化的需要。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种要素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乡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虽然省市县三级志书也是记载和反映了地域文化。但从总体上说，三级志书记述事物基本上是从宏观或中观角度，对地域文化的记载和反映不够具体详细。而村志仅记一村范围的事物，它能具体而细微地记载和反映本乡本土的地域文化，如地理环境、风景名胜、传统产业、生产工具、生产技艺、土特产品、民俗风情、风俗习惯、方言土语、异闻传说、歌谣谚语、村规民约、传统艺术等，为地域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积累丰富的微观资料。民国时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

根就是乡村。”村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村志编修是抢救乡村历史文化的需要。对于多数村庄来说，历史上从未开展过村志编修，很多宝贵的村史资料只是存在于老人的记忆和世代代村民的口传之中。如果不及时将这些只存在于流传和记忆中的历史资料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很可能失传，成为各村后代永远的遗憾。通过编修村志，全面、系统地记载村庄的历史和现状，留下一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村民、村事实录，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历史资料，其“存史”价值随时代推进将会愈加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棚户区改造，城区规模扩大，一些村庄拆并聚集，部分村庄已不复存在。据统计，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全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余个。2019年，按照全省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的要求，温州市启动了村（社区）规模优化调整工作，经过调整，全市建制村从5383个减少至3034个，撤并率为43.9%。许多村落连名称都没有留下来。城镇化的迅速推进，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村庄的消失。随着

村庄消失，村庄文化尤其是那些经过漫长岁月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也会随之消亡。如在有形文化方面，诸如古街巷、古建筑，古树、古碾老井等，随着村庄拆迁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形文化方面，随着村庄变成社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农业经济向城镇经济转化、传统的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化以及居住环境、生活方式、谋生手段等的改变，农耕时代延续下来的民风民俗、村规民约、生活习惯、乡土文化逐渐消亡。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许多村落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留住乡村历史文化的方法只能是用文字和图照等将其记载下来，编写村志就是最好的形式。

（四）编修村志是资政参考、助力乡村振兴的需要。村志是村庄的百科全书，它记载村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详实记载村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民风民俗、建置沿革、村民村事、经济兴衰，从自然环境到人文活动，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均作全方位、多视角的反映，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村志不但能成为各级领导者重要的决策参考书，而且村民通过阅读村志，能够明确村庄发展的曲折历程，更加坚

定地拥护党和国家目前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通过编修、发行村志，不但可以流传本村本乡，还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村庄的历史与现状，达到了宣传的作用，为招商引资、振兴乡村经济打下基础。

（五）编修村志是留住乡愁、教育后人的需要。村志是村庄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所记的村民村事是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事例，这里有政治生活、经济活动、文化娱乐情景，村民会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村志以其生动翔实的材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地情结，留住乡愁，既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教育效果透彻深远。

二、村志编修组织模式的选择

按照牵头组织编修的主体不同，目前村志编纂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类。

（一）乡村自发组织开展村志编修。这种情况最多，两轮修志期间编修的村志大多属于此类情况。这些乡村一般来说都是经济发展较好，并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自身

比较显著的特色。以瑞安市沈岙村为例，20世纪90年代私营企业就大发展，2000年以后就进入工业经济发展时期，2014年已经成为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量靠前的村，是中国淘宝村。这些村修志属于乡村自发行为，编修形成的村志内容包罗万象，绝大部分村志在篇目设置上存在套用县志体例的痕迹。如瑞安市《沈岙村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一级目录设有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源流、经济、村庄建设、党政群团、兵役民兵、文教卫生、文物古迹、民情风俗、人物等十章。泰顺县《西地村志》一级层次按照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部类进行设置，二级设有村域人口、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景点景观、政党群团、村政、军事、农业、林业、水利、工商金融、教育、医药、体育广电、地方文化、文物保护、居民生活、习俗宗教、社保救助等十章，外加人物、附录。

（二）省级以上地方志机构启动的名村志文化工程。其中以2016年10月底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的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最具代表性。按照名村志文化工作的实施方案，由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推荐，省级地方

志机构审核报送中指办。中指办提供村志基本篇目，入选乡村参考基本篇目设计符合本地特色的篇目。在编纂过程中，各地村志编纂不仅接受中指办专家的指导和评审，同时还得到所属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紧抓乡村地域的“名”“特”，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调查走访，评审确定村志篇目方案，极大保证了村志篇目安排的科学，摒弃省市县三级综合志书的体例模式；同时专家评审贯穿编纂全过程，又保障了志稿编纂的高质量。不过，名村志工程对入选乡村把关甚严，无法覆盖全国大部分的乡村。

（三）县级地方志机构组织的全区域村志编修模式。全区域村志编修模式以青岛市崂山区组织的“村村修志”工程、上海金山区村志编纂为代表。金山区从2011年启动村志编纂工作，先在金山卫镇进行试点。2012年向全区全面推开，2017年底编撰工作全面完成，2018年完成修订。2019年金山区124部村志丛书首发，金山亦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全区域村志覆盖的县级行政区。2006年，青岛市崂山区开展“村村修志”试点工程，至2021年全区139个农村社区均完成修志工作，实现了村村有志。

村志编修的三种组织模式，各有利弊。各地在推进村志编修工作时，对采取何种模式是因地制宜的。温州市在谋划村志编修工作时，无论是从当前要把地方志工作全面向基层延伸的要求，还是从市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要求，都是指向第三种模式。2019年11月在温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市长姚高员提出要在全市开展村志编修工作。在2020年10月举行的《温州市志》首发式上，姚高员再次提出编修村志的具体要求，要用3至5年时间，完成全市3000多个行政村村志的编修任务。从全国村志的编修现状看，金山、崂山两地县级行政区的村志全覆盖为我们提供了成功案例；从地级市层面全覆盖看，温州的村志编修在全国走在前列。从温州实际看，各县（市、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村与村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大多数山区村庄集体经济水平不高，能够单独组织编修志的村占比不多。新中国成立后至2020年，温州市已经公开出版的新编村志只有7种。不久前的一次全市村志编纂调查显示，全市有修志意愿的村还不到50个。如何让3000多个村都启动村志编修，是一项体量庞大的工程。在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后，市志办决定变通采

用第三种模式，以乡镇为单位推动全市村志编修工作，并于2020年末在文成的铜铃山镇和西坑畲族镇启动村志编修试点工作。两个镇各有8个村，各镇设1位主编，各村设1位编辑和1位资料收集员，最后形成《文成县村志丛书》铜铃山镇卷和西坑镇卷。市志办和文成县志办共同建立村志编修领导小组，定期组织专家，通过培训会、研讨会、评审会等方式，对试点单位工作进行评议、给予指导。

三、对全区域村志编修的思考

在为时半年多的村志编修试点工作中，我们也遇到了诸多的问题，有思想上的，如对村志编修意义认识不到位，对村志全区域覆盖难度认识不足；有编纂业务上的，如编纂团队组建困难、志稿撰写脱离志体要求、各村之间资料内容难以平衡等；也有行政推动上的，如项目进度不如预期导致的后期经费不足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后期开展全区域村志编修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要不断增强基层存史修志意识。近年来，随着年鉴编纂的常态化、二轮修志的开展以及地方志宣传的推进和强化，地方志工作已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这种关注度和

重视程度不足以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村村修志的热潮。地方志部门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参与到乡镇、乡村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向中心工作靠拢，加速地方志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融合，提升地方志在乡村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如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礼堂建设方兴未艾。在参与文化礼堂建设中，方志部门不仅要巩固自身赠阅志鉴书籍等既有成果，还要发挥好地方志的软实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参与礼堂布展建设；在文化礼堂建成后，还要用好这个平台，用多种方式宣传展示地方文化。除了与中心工作融合，地方志还要积极探索在乡镇农村的应用途径，只有打通地方志工作与乡镇、农村、农民需求的通道，才能为村志编修的全面推广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二）要多管齐下解决修志人才紧缺问题。无论是一轮修志还是二轮修志，修志人才紧缺一直是地方志工作的瓶颈。在此次村志编修试点工作中，组建编辑团队的难度不小。如西坑畚族镇有8个行政村，按照每个村1名编辑，要选用8人。在遴选编辑时，为促其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编修组更倾向于挑选本村村民。但西坑村当地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留家的大

多是老人和小孩，无力承担修志这项劳心劳力的工作，即便有同志各方面资质都适合参与该工作，其主动承担的意愿也不强烈。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全市山区、乡镇、农村比比皆是。虽然各地二轮修志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储备，但仍不足以应付全区域覆盖的村志编修局面。为此，在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上，要从“增”“用”“筹”上下功夫。在“增”上，要继续提倡“专家修志、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让更多有意愿修志的人参与到村志编修中；在“用”上，要留住和用好现有的修志人才；在“筹”上，就是要统筹用好现有的人才资源，探索形成村志编修人才培养机制。

（三）要分批分阶段在各地推进村志编修工作。此次文成两个村志编修试点镇，虽然同时启动，但因为两镇实际情况不同，并未能按照预期在相同的时间节点完成任务。针对后期开展的全区域修志，我们首先要进行全区域摸底调查，待各方面都成熟了，再启动。分批分阶段推进有助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修志人才紧缺的问题，提升人才修志参与率。正所谓“实践长才干，历练出人才”，在项目的实践中获得

的成长是平常不可比的。在这个村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以供下一个村继续参考。二是解决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此次文成2个试点的工作经费由志办、镇、村三方共同出资，但因进度达不到预期，也已出现经费不足现象，如果文成全县17个乡镇243个村（包括14个社区和1个居民区）同时启动村志编修，经费压力将会非常大。

（四）地方志机构要充分做好业务指导上的准备。在试点过程中，市、县两级志办从组建编辑部到辅导督促，从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到志稿撰写等环节全程参与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志初稿的形成和评审的成功召开打下基础。但评审的结果也暴露了业务指导上的不足。因各村在内容设置和资料选取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西坑畲族镇每个村的篇幅在4万字到8万字之间，而铜铃山镇每个村的篇幅在7万字至10万字之间，篇幅不平衡

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在后期项目过程中，业务指导方面要加大撰写人员的业务培训，并提供村志撰写模板等。除此之外，还要根据当地情况对其进行分类，根据种类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模板，既要有山区乡村的，也要有平原地区经济发达乡村的；既要有均衡发展乡村的，也要有特色鲜明名村的。

（五）要权衡志稿质量与覆盖面的轻重关系。历史上存在修志行为的乡村少之又少。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乡志具有强烈的抢救性保护特点，修比不修好，早修比晚修好。开展全区域村志编修工作，其着眼点应该在全区域，强调的是覆盖面。因此对村志的编修质量就不能以省、市、县三级志书的标准去严格要求。

（作者单位：温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文成县村志编纂工作经验交流

◇ 雷晓敏

2020年10月底，温州市确定文成县作为全市村志编修试点县。11月，文成启动西坑畲族镇和铜铃山镇的村志试点编修工作，成立市、县、镇、村四级编纂组织机制，坚持传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全面记述与突出特色并重，探索以镇为主体的综合村志编撰工作。在编修过程中，总结得出以下几点工作经验。

一、围绕主线抓关键，实现三大目标

（一）抢救珍贵记忆，保存鲜活历史。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许多乡村的经济业态、社会形态、村庄沿革、人口迁徙、事物变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乡村搬迁集镇化，村民进城市民化，许多自然村正在逐渐消失。《西坑畲族镇村志》记录了塘垟村19个自然村，其中10个自然村于20世纪90年代因搬迁而成为废弃

村；鳌里村历史上曾经出过7个举人（清代）、54个国子监生和贡生，村中建有17座四面屋、9座家族祠堂等等。这些内容都在村志中用文字、照片等形式及时记录下来，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展现乡土文化，留住乡愁乡情。《西坑畲族镇村志》记载了梧溪村的古宅古阁、古人文，叶岸村的平民英雄村事迹，塘垟村的廉政文化等等。这些真实的史料、生动的事件能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有助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祖籍为鳌里村的企业家周光平就是通过村志了解到鳌里村的古文化、宗族文化、红色文化等，为之深深着迷，于是组织18位族人，回到鳌里开展寻根之旅。

（三）实现存史资政，助力乡村共富。《西坑畲族镇村志》记载了鳌里村红色文化、古建筑文化和教育

文化，展现地域文化特色，激发人民群众建设家园的热情。鳌里村民集资800多万元，先后建成文化礼堂、周定纪念广场、翰墨廊、八德壁等人文设施。借鉴村志记录的内容，西坑畲族镇做到规划与设计相协调、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将鳌里纳入重点发展村，投入600万元改造整治村庄环境，打造集红色研学、科普教育、乡村休闲、生态运动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烽火之旅。2021年12月，周光平向鳌里村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进一步加快鳌里的兴村步伐。同年，鳌里村入选浙江省第十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名单。

二、把握要素定基调，突出五大特点

（一）实现“全”。根据地方志体例和篇目设计要求，以村为篇，篇下设章、节、目，每个村包含5个基础章节。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姓氏变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村庄事业、人物、大事记等。每个村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根据村域实际情况增设章节内容。

（二）体现“简”。一方面是结构形式上的“简”，《西坑畲族镇村

志》《铜铃山镇村志》是文成县首次以镇为主体，各村合力编写的简志。另一方面是内容上的“简”，编修组根据各村客观存在的事物立目，根据各村搜集到的实际资料来权衡篇幅，如民俗这一块内容，地域上大同小异，就只写各村独有或特有的民俗，其余不一一赘述。

（三）突出“特”。文成是传统的农业山区县、浙江省第二大侨乡、革命老根据地县，旅游资源丰富，村志编纂反映各村的具体特点、突出村情就显得尤为必要。对地方特色单列一节或升格为一章，如凤鸣民族村的畲乡文化、让川民族村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鳌里村的红旅文化和教育、叶岸村的平民英雄村、梧溪村的古村落、塘垟村的廉政文化等，均采用专章的方式重点记述。

（四）注重“新”。一方面是创新体制机制。《西坑畲族镇村志》《铜铃山镇村志》是以乡镇为主体，行政村为依托，成立市级行政村志编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县、镇编纂委员会及村级编辑部，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共同把关推进编纂工作。另一方面是创新体例体裁。运用传统体裁的同时，这两本志书创新运用了链接的体裁形式记录重点内



《西坑畲族镇村志》《铜铃山镇村志》

容、特色内容。

(五) 追求“精”。一是资料翔实。每个村落实一个资料员，开展资料搜集与核实工作。同时，市、县、镇、村及主编五级联合，对最终稿件进行审核把关，追求精益求精。二是图文精炼。对材料高度浓缩，用最简洁、最概括的文字表达最深刻、最客观现实的内容。同时，邀请专业摄影师跟随拍摄，追求高质量的志书图片。三是纲目科学。选配一个对本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情况都非常熟悉了解的主编，从整体角度出发，统筹谋篇，并在省、市领导专家的指导下，在与县志办的沟

通交流中，科学合理设置村志纲目。

三、聚焦难点寻突破，解决四大问题

文成建县历史短，地方志工作基础薄弱，村志编修工作还处于空白阶段。同时，文成还是浙江省26个山区县之一，经济基础较差，修志队伍整体力量较弱。针对这些客观问题，编修组探索了以镇为主体，行政村为单元编写合成村志，这样既有效弥补了志书主要的短板，也解决了经费、人员、时间和质量的问题。

(一) 经费问题。假如一个村写一本村志的费用为30万元，文成县有

243个村（社），合计超7000万。此次试点编写的由各村合成的镇村志，总经费每个镇约60万元，17个乡镇合计约1000多万元，极大缩减了修志费用。同时，经费由县财政补助，乡镇自筹，村或企业、知名人士赞助等多种形式予以保障，使修志工作无后顾之忧。

（二）时间问题。村志编修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耗费人力物力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此次试点编写以镇为主体，行政村合成的简志，西坑畲族镇、铜铃山镇利用一年时间完成编写工作。在此基础上，2022年起分四轮开展编修，2030年全县完成村志的编纂出版，10年时间就能实现全县村志编修任务全覆盖。编修组第一轮启动6个乡镇（55个村）的编修工作，并计划于两年内完成，极大缩短了时间线，加快了工作进程。这样既能在短时间内赶早抢救乡村文化、保存历史，又能提前实现村志的全覆盖。

（三）人员问题。修志人才匮乏，从村志撰稿人员的情况看，聘用

撰稿人员年龄结构偏大，65岁以上的有近半数，且知识储备较弱，文字功底偏浅，缺乏修志经历的近八成以上。此次试点编写以合成简志的形式，一个乡镇只需要一套班子运作，极大弱化了此前修志对人员素质的较高需求。此次试点工作，获得省市高度评价、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乡镇党委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吸引了一批史志爱好者加入史志专家库，充实史志编研队伍，实现了社会化的人才整合，为进一步推进村志编纂工作凝聚合力。

（四）质量问题。在此次编修试点工作开展前，文成有多个村庄已自行开展，但由于没有组织保障、经费保障，又缺少审核把关，导致个别志书质量不高；另外珊门村、鳌里村历时多年，至今还未完成村志初稿。此次试点成功后，两部村志的内容和相关的组织机制、评审机制以及在编修过程中需要避免的问题，都可以供其他乡镇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文成县地方志研究室）

浅谈县（市、区）修志工作中的 若干关键要项的把控

◇ 周田田

秉承中国悠久的方志编纂优良传统，第二轮修志在方式方法上继承了第一轮的成功经验，同时发挥了资金、先进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工作成果丰硕。30多年来，笔者全程参与两轮县（市、区）志书编纂及参评志稿等具体工作，深感其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深入探索总结修志的规律性及存在的问题，为第三轮修志作思想与资料上的准备很有必要。结合多年志书编纂实践和体会，就县（市、区）方志编纂中若干关键要项的把控略陈浅见。

二轮县（市、区）修志工作 背景和氛围比较

全国第一轮志书大都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6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各省

市积极行动，于21世纪初开始到2020年底完成第二轮修志。与第一轮志书相比，无论在资金还是经验方面都有着许多有利条件，背景和氛围有很大不同。

（一）领导重视和关心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修志、读志，并善于用志，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为地方志工作更好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党政领导对志书编纂的重视和领导。如第一轮某市志编纂工作于1994年启动，到1997年5月，还有25个承编单位未供稿，资料缺口很大。经请示报告后，市政府召开修志推动会议，并把交稿完成情况列入年度考核。至当年7月底，稿子基本交齐。第二轮修志期间，各县（市、区）至少有一位领导分工主持修志工作。其间，尽管人事有变动，可每次新领导到位不久，就会主动关

心修志工作，到地方志办公室开展调研活动，着手解决实际困难，创造地方志工作良好氛围。

（二）营造依法修志环境

第一轮修志工作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县级修志会议开得不多，各承编单位对志书编修的重要性认识不统一，修志之事难以及时落实到位。2006年，随着《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地方志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轨道。从行政推动转变为依法修志。第二轮修志工作列入县级政府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做到领导、机构、经费、人员、条件、保障六个到位，统一了社会各界对修志工作的认识，让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成为常态。

（三）健全完善修志组织形式

第一轮修志中探索创立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落实”的修志形式在第二轮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使得各条线任务推动力极强。县（市、区）一般都会定期召开编纂工作动员会、编纂工作推进会等，安排和部署不同时间段的修志要求和具体任务，整体推进修志进度，促进各部门积极配合，做到依法修志。第二轮修志建立起来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承办、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法制保障、社会

各界参与”的新体制，是切合实际、切实可行的，长期坚持完善，能够有序启动第三轮修志工作，加快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等的编纂进度，实现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修志经费保障

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中“一纳入，五到位”的规定，第二轮志书编纂启动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编纂经费按照设立专项、确定基数、按工作进度逐年安排的原则，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供给。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同意地方志办公室招聘编修人员，并下拨资金，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确保修志工作顺利开展。有了一定的财力和各方支持，减少了修志人员的后顾之忧，全身心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在质量和进度上力求突破。

（五）编修队伍不断强大

只有高素质的志书编纂队伍，才能编修出高质量的志书。第一轮县级修志白手起家，修志机构为单独设立或临时机构，修志人员大多半路出家，专业知识较欠缺。第二轮修志队伍的组成条件较首轮有进步，地方志机构普遍设立，日常从事年鉴编纂、旧志整理等实务，积累了修志编鉴的

实践经验。其中，不乏有一批曾参与第一轮修志的撰稿人和编辑，一些亲历改革开放的退休老领导、业务骨干、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书编纂，还有大中专院校文史、地方志专业毕业生考入，或是直接从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乡镇干部中选调。修志队伍知识及年龄结构持续向好。

二轮修志实践的几点思考

修志是对历史的再认识、再梳理、再借鉴。目前，第二轮县级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全面总结第一、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学先进，寻短板，总结提炼修志中的若干重大事项的把控规律，为第三轮修志开好局作铺垫，是当前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主编人选

修好志关键是选人得当、特别是选好主编。“众手修志，志成一人”，道出了主编在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编即志书编纂的具体组织者。一部志书的质量、个性和特点与其主编关联度极高，其中主编的编纂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求是精神、专业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和身心健康等在志书编纂中起关键作用。清

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主编应具有“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康海、章学诚、戴震、黄炎培、李泰棻等名志的主编无一不是文史学家或一代文豪。“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因而主编还必须熟知地情，深谙地方特色的内容应在哪个部门、哪项事业发展中显现，只有把这些点记述到位，地方特色才能更加突显。如山东《章丘市志（1986—2005）》把章丘市埠村街道埠西村诞生的全国第一部《村民自治章程》作为地方特色纳入该志民政部门的基层政权建设内容中，彰显了法治乡村建设的“章丘经验”。

综合30多年修志实践和近期对参与两轮修志老同志的访谈，主编选任的重要条件，应具有较高威望、通晓本地域或某行业的历史与现状、扎实的理论功底及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人选应为地域文化名人、退休学者型领导、地方志资深领导专家、史学专家，其中刚退休且在综合部门任过职的领导为最佳人选。

（二）篇目设置

志书篇目设置科学合理是志书编修的关键。民国方志名家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曾说：“故预拟篇目，皆属假定，纂著之际，删并增

析，一随当地材料多寡轻重之宜。”篇目从开始拟定到最终形成，需反复推敲、不断锤炼，直至达到门类齐全，领属得当，特色突出，题文相符的普适性的篇目设置终极要求。其中，把形成的篇目框架公开征求各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的修改意见，同步邀请工业、农业、商务、发展改革、文化、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审查篇目，深入探讨，形成地域特点最为关键。如2006年无锡市史志办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了《无锡市志（1985—2005年）》篇目及承编单位征求意见的公告，收效良好。第二轮志书篇目设置，总体上都能围绕改革开放主线，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多数志书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设置方式，如采用专记和分志篇目下设改革内容的章、节的体式，突出时代、地域特点及反映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该轮篇目拟定也存在仓促上马、论证不足等问题，导致遗漏具有地方特色要项等问题。所以篇目框架设置前，主编等要尽可能全面深入系统地调查、分析地情和特点，防止要项丢漏。

（三）资料收集和保存

1. 资料收集。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夫方志之著述，……其最主要

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收集资料。”资料收集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也是实现志书功能作用的首要条件。一部好志书的存史、资政及学术科研价值、可读性等，都与入志资料的丰厚性、真实性、科学性、典型性及地域性息息相关。第一轮县级修志的上限不作硬性的统一规定，基本都为事物发端。因此，首轮资料搜集工作任务繁重，除查阅本地档案馆、图书馆文书档案外，还得跨域搜集。第二轮修志断限在近20年，大部分资料可在本地档案馆和各相关部门、单位查找。但由于2000年之前的电子文档在县级层面还未普及，之前的资料也有散失，加上20多年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其资料远非现存文书档案可全面提供。如第二轮志书要充分记述和反映的人口、商贸、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单靠档案馆或某几个单位提供资料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改进和创新资料收集方式方法并力求突破。第二轮修志不仅仅依靠部门供稿和查找档案资料，还充分利用年鉴、大事记、专业志等地情资料及党政网、政府办公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搜集，注重调查走访，梳理、分析、归纳、综合在手资料，直至能显现事物发展的历程和轨迹，才予以实录。

2.资料归宿。宋代著名历史学家李焘为编撰好《续资治通鉴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屉匣二十枚，每匣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真可为法。”这种把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分类保存方法，今修志中尤其可效法。第二轮修志完成后，一般修志资料归档一式一份，应装订成册或装入档案盒内，分类放在修志单位橱内，并建立借阅制度，各类原始资料、文件信息未经批准不能借阅和调阅。重要的或利用频繁的资料可适当增加归档份数，分别移交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等处。（1）独一无二的修志资料要移交档案馆。修志与档案的关系紧密，史上地方志与档案同属史官文化，志书的编纂以丰富的权威的档案史料为依据，同时修志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修志资料，大大丰富本地的档案馆藏。（2）修志资料中如有关历史图照、手稿、口碑资料等可作为文物史料由地方博物馆收藏，作为馆藏直接在地方博物馆陈列中展出。（3）存放在方志馆。通过沙盘、模型、塑像、展板、影视数字、实物展厅等大平台，把修志资料实物化、展品化，无疑是方志馆立足之基、增长之源。在第二轮修志资料登

记存档后，地方志工作者要从原始资料、汇编资料、长编资料、专题资料中提炼出最新的有价值的地情信息，通过网站、资料库等方式发布，想方设法广辟信息源，把修志资料转化为全方位开放状态的地情信息，实现修志资料的深层次服务，使地方志办公室成为地情资料信息发布的权威机构，切实提升修志资料归档保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信息化。

（四）志稿评审

志稿评审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第二轮县（市、区）志书初稿编纂完成后，严格执行志稿三审三校制度。聘请相关专家学者、老领导等参与评审，尽可能核误纠错、拾漏补缺，提出修改完善的方法和路径。志稿评审主要是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一定权威性。如上海市建立地方志书评审专家库，制定专家入库标准和审稿制度；2018年，浙地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专家指导评审工作的意见》提出如专家资格条件、推荐方式、分类入库等意见，并通过适时视情检查专家工作情况、定期调整补充等方式，不断提升专家指导工作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县（市、区）志稿评审一般与修志指导工作紧密结合，评审队伍博采众长，多角度审

稿，领导专家给出的评审意见有针对性，合理性较高。但也有的领导专家评审意见较空洞，缺乏给编辑提供可参可鉴的修改实例，指导效果不强。评审中还存在对个性的内容持否定态度较多的现象。因此，省级地方志部门要在评审实务上制定和推行可操作性强、便于遵循的评审标准，使评审人员可对照标准，处理好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等评审内容。在评审过程中，由于缺乏交流，评审人员不一定全面了解编纂人员的编辑意图，从而影响了评审效果。面对各有各的道理，责编要反复推敲打磨，勇于提出自己的主见，摒弃畏难情绪，立足当地实际及资料掌控的程度，借鉴吸收，积极与评审人员加强联系沟通，形成良好互动，一切以提高志书质量为重，最终由主编定夺。

（五）对前志的补遗纠误

修志工作难就难在古今资料浩如烟海，入志的资料必须真实可信。补遗勘误是我国古代续修志书的传统，汲取前志长处，弥补前志不足，方可超越前志。第一轮志书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少第二轮志书将前志补遗勘误工作做得到位。如山东省《丰南县续志（1986—1993）》除在

有关篇章中进行补正外，还在志尾专设“补遗”和“勘误表”。《垦利县志（1986—2002）》在“附录”中设“第二部分上志纠误”。云南省《石屏县志》在末卷专设“补遗勘误”卷。上述都是第二轮志书对补遗勘误几种体例的设计安排，体现了修志实事求是的精神，确保志书的公信度和权威性。然而，已出版的第二轮志书中，设置“补遗勘误”的为数不多。在全省第三轮修志启幕之际，应认真审读第二轮志书，查找缺失错误，并接受社会检验，进行整体校勘，在第三轮志书中作必要的补遗勘误，力争为后人留下不遗不误的志书。

新发展阶段，地方志部门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全省第三轮地方志启修之际，梳理分析地方志工作存在的短板，并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优化地方志系统队伍和人员结构，加快实现地方志数字化，创新修用并重，推动修志成果转化应用，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守正创新，融入并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再创修志工作新业绩。

（作者单位：瑞安市地方志研究室）

戴栩与《江山胜概楼记》和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

◇ 张声和

戴栩（约1180—？），字文子，戴溪族子，永嘉县菰田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累官定海县主簿、太学博士、秘书郎、衡州知府，终官湖南安抚司参议官。学于叶适，得其文章法度，诗风与“永嘉四灵”相近，著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瓯郡要略》《浣川集》。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十卷，其中诗三卷。《江山胜概楼记》《三十六坊记》《思远楼》等诗文中所展现的内容，是南宋温州城市繁荣景象最好的见证。

笔下江山胜概 文中古郡宏伟

《江山胜概楼记》创作于绍定年间，700多字的描述极尽展示了永嘉的繁华，具有文史属性价值，全文如下：

谢康乐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

始即城北门为楼。以康乐泛中川，涉孤屿，历览倦乎江纒，因取北亭叙别之诗，借楼以表之。

然《晋志》永嘉属临海，合三郡户不满二万，今较以一县，何翅倍蓰！计其当时荒凉寂寞，翳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塵肆派列、阗阗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倾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楼跨大逵，自南城直永宁桥，最为穰富，俗以“双门”目之，而罕以谢称也。独郡有大宴会，守与宾为别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车迎道殿河，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观瞻而已。其在斯楼也，或牖高弗启，帷帘复帐，曾未覩江山之面，而詎能识康乐之心哉！

四明史公以奎阁月卿藩宣我邦，尝按图牒登楼而玩之。病其庠陋不敞，且颓栋落楹，础没而瓦漂。慨曰：“江山信美，而谁与领之？”乃辟旧址，乃鸠新材。两庑旁翼，三闾

洞开。周以栏，临以罟罟。白滌界其前峙，罗浮接其右隈。斗山回缭，迭为崔嵬。大江横以东下，势欲去而徘徊。见夫云霞出没，景魄往来。寺塔映乎林壑，艘舶凑乎帆桅。于是，江山之胜与目力不约而谐矣！榜曰：“江山胜概”。以与众共之，而题康乐诗于屏间，然则康乐始独受是楼之名，而不专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实，而得全其实。公与康乐神契于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谓善学康乐者欤！虽然昔人论江山之胜者，以险持壮，以德持险。而观眺之胜不与焉，非以为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观眺之胜从之也。郡城之门十，而北隅居其五。盖屏蔽大江，便于守御。自郭山抵海坛，然后达于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墮圯日增。公尝曲虑密筹，计丈尺，度土功，将请于朝，节郡费以新之，可谓得设险之政矣。

双门本唐名，后易为望京。郡俗侈外而窳中，高车大盖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隶亡别。故公每欲辩名分，崇礼节，而民狃于故习，未遽革也；惟举善而教，使之见义而心服，闻过而意消。则人和之效又在于设险之先者，兹不亦政德之两全欤！夫合内外具本末，公之为是郡也。允协于古道，则江山之胜备。吾观眺者暇日，

从公而登之，可援笔而赋矣！

戴栩的《江山胜概楼记》，对南宋温州的经济富庶、商业发展、市民社会、都市形成等进行了刻画。如用人口变化来反映温州的景象，晋时属临海，三郡总户数还不到二万：然《晋志》永嘉属临海，合三郡户不满二万，今较以一县，何翅倍蓰！

江山胜概楼，是南宋绍定年间知州史宜之倡导修建，为纪念谢灵运任永嘉太守700年而建，是一大盛事：谢康乐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门为楼。以康乐泛中川，涉孤屿，历览倦乎江纒，因取北亭叙别之诗，借楼以表之。《江山胜概楼记》中，描写温州城内“市声倾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的繁荣景象，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史料佐证，也可作为现代活力温州历史溯源，是城市的金名片。南宋永嘉的城市规模与晋代相比，大幅拓展，店铺林立，商业繁荣，地方官宴游与市民同乐。

戴栩在《江山胜概楼记》中说明了郡城共有10座门，北边占了5座，也是作为守御之用的城门：郡城之门十，而北隅居其五。盖屏蔽大江，便于守御。自郭山抵海坛，然后达于三隅，延袤十八里。南宋温州虽经济发

达，但要造这样一座楼，也要再三筹划，从节约郡费中支出：公尝曲虑密筹，计丈尺，度土功，将请于朝，节郡费以新之，可谓得设险之政矣。

《江山胜概楼记》中写的楼，是取自谢灵运的“北亭叙别之诗，借楼以表之”。重现了永嘉吏民群集在北亭（今温州望江路一带）与谢太守惜别的场景。谢灵运有《北亭与吏民别诗》：刀笔愧张杜，弃繻惭终军。贵史寄子长，爱赋托子云。昔值休明初，以此预人群。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犹抱见素朴，兼勉拥来勤。定自征伐檀，亦已验惟尘。晚末牵徐荣，憩泊瓠海滨。时易速还周，德乏勤济振。眷言徒矜伤，靡术谢经纶。矧乃卧沈疴，针石苦微身。行久怀邱窟，景昃感秋旻。旻秋有归棹，旻景无淹津。前期眇已往，后会邈无因。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这是一种深情、恳切、真诚的表露，他检讨自己的政治作为，诗中表达与官民的别情，悲怆而感人。他对送行的永嘉吏民说：自己没有刀笔吏治的念想，也失去投笔请缨的志向，只有雅好文史，常长啸于城中道旁，为忧世隐逸之民而歌。在永嘉没留下什么政绩，加之体弱多病，所以旻秋时节，理棹还乡。最后他对吏民寄以保重之辞，

毫无做作之态，“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谢灵运将自己完全放在吏民平等的地位，体现了太守真切的人文关怀。

当时的永嘉城不但有戴栩描述的盛况，当地诗人对城内生态和景观也有大量的记述。如徐照《移家雁池》写道：“不向山中住，城中住此身。家贫儿废学，寺近佛为邻。雪长官河水，鸿惊钓渚春。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翁卷亦有《雁池作》：“包家门外柳垂垂，摇荡春风满雁池。为是城中最佳处，每经过此立多时。”“四灵”之后的永嘉诗人赵希迈在《南台徐灵晖徐灵渊皆有作》也写道：“山峭石台平，天低可摘星。岸回分水势，城缺见州形。晓树来孤鹤，春吟忆二灵。客行贪访古，柳下一舟停。”

坊立藩饰聿至 街延文化浸成

戴栩的《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是温州古代城市建设的重要文献。

分画井廛，标表术巷，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谓教？示以好恶，而着之风声；兴其视听，而纳之轨物，斯为教矣。古者，闾必有门，孝友睦姻

任恤有学，昕出夕入，实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为坊，坊门纵闭，水沴禳焉。然则唐之坊古之闾也。其后植以双木，结屋覆之，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就湮，摧圯而终废哉！

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较诸雄藩会府，虽不及毗列，城则过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数。比淄黄者称寺观，目姓氏者兼艺能，大略有以辩识足矣。质而俚，厖而未纯者，弗计也。后乃文化浸成，藩饰聿至。

《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绍圣间杨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故摭其胜地，则容成、雁池、甘泉、百里是已。溯其善政，则竹马、棠阴、问政、德政是已。挹其流风，则康乐、五马、谢池、墨池是已。否则歆艳以儒英掖导，以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与夫扬名、袞庆、绣衣、昼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于防范，俾家警户。省则孝廉、孝睦之号，遗忠、遗爱之目，或旌以招贤、从善，或薪以简讼、平市，义利明而伦类彰，取舍审而操向正，有不说之教焉。

独慨夫风霜之剥勒，水火之荡

毁。百二十余年，而沈守枢更建如杨侯之旧。又五十年，而焕章少卿史公实来其规设，益逾于沈矣。观其博栋竦楹，翼以楫础，飞椽延椽，被之藻彤，阡陌周匝，绚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触名感义，一睹而三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绍其续增者，曰状元、袞绣、祈报、丰和。复其续废者，曰崇仁、荣亲，又永宁、嚶酒、宝珠、井莲。为一郡都会，撤而新之。还明伦曰登赢、易浣纱曰鼎桂。总四十，而仍旧称以杨侯重也。初杨侯既名其坊，又什以咏之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至今稚髻弱变交口诵道，岂非以其人蕴籍而平易近民之效哉！

今焕卿公以锐志恢永图，以余力辑小务。凡城郭途路，役之至难者，既已灿然毕就。其于区坊琐琐，若不足为公纪，而郡人请伐石以侈之。盖公不独优于治办，而其礼贤下士，有足多者。乡饮释菜，日与诸生周旋，揖逊士至，歌而颂之如鲁泮。然公于教思无穷之义，其必有得于政理之外矣。

杨蟠于绍圣二年（1095）在温州城区重建三十六坊，重定城内三十六坊名称，其实质上是对温州城市的整治。他又在次年（1096），将三十六

坊增加到四十坊。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文献，他描述经杨蟠扩建后的四十坊，“观其博栋竦楹，翼以榭础，飞椽延檠，被之藻彤”。四十坊内各有功能分工，店铺密布，诸业齐全，酒楼、茶坊、饭铺、浴室、妓院、瓦舍、勾栏……尽显繁华，“从来唤作小杭州”即由此而来。另据叶适的《东嘉开河记》载，温州经杨蟠整治后，“环内外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弈局”。温州经杨蟠等历任地方官员苦心经营后，发展到南宋时期，城市已经相当繁荣了。

温州城的三十六坊规划和建设，是北宋时期温州城市街巷体系和城郭道里标识细化的初现。从杨蟠置三十六坊到戴栩写下《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的150年来，温州坊额在城郭中标识作用加深，地名教化作用显现。地名的产生，是由地方官吏、文士儒生出于“教化”与“壮观”的出发点来推进的。这对于当下城市持续扩大，地名不断增多但是缺少文化感的情况，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思考的。

戴栩的《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重点突出地名命名的意义，云：“故

摭其胜地，则容成、雁池、甘泉、百里是也；溯其善政，则竹马、棠阴、问政、德政是也；其流风，则康乐、五马、谢池、墨池是也。否则歆艳以儒英，掖导以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与夫扬名、袞庆、绣衣、昼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于防范俾家警户。省，则孝廉、孝睦之号，遗忠、遗爱之目，或旌以招贤、从善，或蕲以简讼、平市，义利名而伦类彰，取舍审而操向正，有不说之教焉。”

坊额之命名，要认真讲究。《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重点突出前知州杨蟠在地名命名上的用心用意，他将此当作行政手段：“分画井廛，标表术巷，此政也而有教焉。”又曰：“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就湮，摧圯而终废哉。”

北宋时期，城市的改建在全国来说也是大势所趋。黄裳（1044—1130），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改青州十六界为三十六坊，“为之门，名各有物，庶乎其有义也。迎春之类以辨坊名之也，延宾之类以遗事名之也，文正之类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类以道化名之也……”。又如，后来的南宋镇江府置七坊，“曰崇德，曰践教，曰静宁，曰化隆，曰

还仁，曰临津，曰太平”。街坊命名，都考虑寓教于名，意义清晰。“为美名以志”，是建坊建额目的，为政设教是普及教化的手段。戴栩的《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揭示了士大夫们孜孜不倦于此的原因。所谓“古者以德名乡之义”“彰善旌淑”，其意义均在于此。

温州自北宋之后，有些地名至今还在沿用：

招贤巷 原名招贤坊，“宋隐士周侃居此，郡为立坊”。北宋时期隐士周侃居住在此，以行义着闻。宋真宗得知后意欲招贤起用，他辞谢不赴。杨蟠因此立招贤坊以示旌表。清代改称招贤巷，民国时期分称招贤巷和滴水巷。新中国成立后，此巷东端向北延至县后巷并连接滴水巷，并称为招贤巷。

庆年坊 杨蟠将其定名，后几经变化。此坊东起信河街，向西转南至丁字桥巷，又岔巷转北至应道观巷，旧称鲍提举巷。宋林季仲《祭鲍提举母文》：“鲍于吾乡雅为着姓，夫人有子，实袭余庆，位列多贤，或参国政。”明代后，以庆丰年之兆又改回来称庆年坊，并沿用至今。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人物蔡幼学（1154—1217）晚年曾住此坊。

遗爱坊 东起仓后，西至信河街，今岑山寺巷一带。杨蟠或是根据宋儒有仁号（者）居此，命名为遗爱坊。杨蟠离开温州后，有诗《去郡后作》：“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岑古渡头。缘觞春送酒，红烛夜行舟。不敢言遗爱，惟应念旧游。凭君将此句，寄写谢公楼。”

文从叶适高风 诗与四灵相近

戴栩除了以上介绍的《江山胜概楼记》《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之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戴栩《浣川集》提要云：“栩与徐照、徐玑、翁卷、赵紫芝等同里，故其诗派去四灵为近，然其命词琢句，多以镂刻为工，与四灵之专主清瘦者气格稍殊，盖同源异流，各得其性之所近。”戴栩结交的友人多为叶适门下诗人。他的诗作，虽出入“永嘉四灵”之间，但不局限于四灵诗风，抒其胸臆之诗占了一定比例。因他与叶适走得近，文法叶适，风格也与其酷似，所著《五经说》《东都要略》等都颇具见识。戴栩在《题吴明辅文集后》序中回忆道：“颇忆从水心（叶适）游，时遇佳题，辄令同赋。”戴

栩的诗文中，奉呈叶适的诗多首，又代老师作《贺正表》三篇，师生交谊密切。戴栩《贺水心先生七十》中的“著书新稿天无尽，阅世闲心海不波”，写的就是水心先生在门人心目中的形象：欲盟鸥鹭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许何。迟此经纶今日后，定须酬折得年多。著书新稿天无尽，阅世闲心海不波。七十却嫌人贺寿，缭墙闭雨长庭莎。

那个年代的永嘉诗人都在叶适的文圈、诗圈里活动，如瓜庐诗人薛师石，也曾有《水心先生惠顾瓜庐》诗：“未成三径已荒芜，劳动先生枉棹过。数朵葵榴发深愧，一池鸥鹭避前呵。路通矮屋惟添草，桥压扁舟半没河。再见缙维访渔父，却无渔父听清歌。”戴栩的诗与之同韵，诗义也相似。水心先生在温州文坛的领军地位明确无疑。戴栩又有《和叶水心会昌观小集》，诗中有赞先生“再拜窥著书，甘以谢华毂。涉海浩无津，眩汗颈为缩”。

戴栩存诗近200首，诗集中较多的都是与当时的名士同僚相唱和的篇章，风景诗占比不多。如与平阳人陈昉（字叔方）有深厚的交情。陈昉曾为吏部侍郎，知福州、建宁府，除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与刘克庄等

并称为“端平八士”。

卢祖皋（约1174—1224），字申之，一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人。南宋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楼钥外甥，是著名的词家，有《蒲江词稿》一卷（96阕）刊入“疆村丛书”。戴栩有诗《送卢次夔赴仲父校书之诏》：离家向京国，客思独从容。有句诗人读，无书馆吏供。蛰雷先一月，晴岭沓千峰。马上思亲处，题缄寄所逢。又一首《宿局次韵卢直院炎夜之作》，描写在官署亭里纳凉的情趣，天气炎热，树枝懒动，用泉水泼洒坐石：市屋炎蒸极，爱眠官署亭。酒泉清坐石，疏纸出危楹。露草有尘色，风枝无动形。怀人兼述句，钟尽钥开扃。

刘植，字成道，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戴栩有《寄刘成道》诗，这样的情景想象与友情传递诗，朗朗上口，却情上心头：归淮方向浙，度尽一年寒。想见添诗卷，传闻摄酒官。雨多江湫暗，米贱客愁宽。旧友参台幕，应留看牡丹。

戴栩以近体诗取胜，举列佳句多联。他的诗内容与“永嘉四灵”相比，形式与门类都显丰富些，即有社会生活，又有名人交往，也有大量家事农事耕犁事。《五月一日出局偶

书》中写的只有四句：坐局无营饭又茶，楚骚词里记年华。小窗不厌经宵雨，红到葵梢第一花。虽是偶书，却有“坐局楚骚记年华”之念，又有“小窗宵雨傍葵梢”抒情，轻松下笔，生机无限。无聊中起意，也是诗情别致，让人厌恶的夜雨连绵，在他眼中会开启天明的小窗，望见葵梢花开，韶光烂漫。这首诗是陈与义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的另一种表述。

戴栩有两首劝农诗《劝耕题正觉寺诗次王文康韵二首》，风格与其他人的劝农诗不同，气场大而地域宽，遥帆与松风，窗日与潮势，梵室与老僧，设置了很多场景与内容，信息量很大：（其一）海山春过半，未见一花开。岩溜无时滴，松风尽日来。前生身已到，归路首重回。只恐山灵笑，衣巾着吏埃。（其二）渤澥东南极，何年梵室开。地形缘水尽，潮势挟山来。古市朝仍暮，遥帆去若回。老僧无一事，窗日射飞埃。

戴栩对农事熟悉，对农民亲近，这点可从农诗中看出来。如《农家》以质朴的诗句，写出田家辛勤的劳作生活：农家何所有，挂壁一锄犁。岁计唯供赋，门前自好溪。剥麻秸覆日，缲茧蛹分鸡。不复知炎月，南风

焚稻泥。

《久雨记农父语》又是戴栩的一首“亲农”诗。冷春湿雨，秧烂甲换，他对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的生活深感担忧，诗中表达了自己枉为朝官，无补于乡农的惭愧：炊烟不出窟，雨久未知晴。冷缩秧芽烂，滋含树耳生。南风愁甲换，湿土怕星明。朝客惭无补，归来伴耦耕。

《渔浦》是戴栩写渔村的诗，笔墨简古，意境幽寂，寄寓了生活感悟：久惭窃食侣鸕鸿，尚以诗名玷至公。喜对亲慈说田里，了无事鄙到船蓬。涨流暂急潮差候，阴霭俄销月在空。梦读道经人一笑，却怜疏直有仙风。

七绝《永康道中》描绘了行于浙西山间的初夏景色和感受，颇具情致。“深树一声”不仅表达了诗人惜春留春的情怀，也衬托出“鸟鸣山更幽”的清静境界：涨渌无风影自摇，芡花生刺藕花娇。山禽不记春归去，深树一声婆饼焦。

戴栩写的《捕蝗回奉化泊剡源有感》，是南宋民生的写照。蝗灾，在古代是乡村的大灾，诗的末联以西汉哀帝时人邴曼容作为自勉，作官不肯任超过六百石俸禄的官职，辄自免去，以此名重当世。辛弃疾有“江头

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说明戴栩修身养志，坚强而清苦：十月五日江信风，小舟摇曳芦苇丛。云端初月吐复翳，时有鹤鹤鸣寒空。梓萸离离挂石发，松萝矫矫垂羽幢。徒步长歌者谁子，乍抑乍扬惊远宠。令人惨淡百感集，呼酒不饮心未降。自从作吏浣泥滓，故书蛛纲尘满窗。海田无种十一，是处奔走祈渊龙。龙慵不报蝗四起，茹草啖叶无留踪。早击暮遮夜秉火，遗子已复同蜩蛩。吏无功德可销变，勉力与尔争长雄。矮屋三间自寒暑，居无十日甘憧憧。却忆莱堂应梦我，白云正隔西南峰。人生富贵亦何用，长年菽水胜万钟。一丘一壑自不恶，我欲从之邴曼容。

戴栩文思如泉涌，笔下举重若轻，如长诗《题顾恺之画洛神赋欧阳率更书同宗御跋寿右司》，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建安七子云锦裳，东阿冠佩俨帝傍。美人依约驻何许，危言和饰含芳芰。虎头妙处似痴绝，丹青貌出花边月。空词无色重徘徊，多态有颦转萧屑。软风吹香态耳苍，蘅皋芝田晴翠长。玉笙飘断牵情梦，羽葆翻开雇影光。兰钗横蛾双凤翥，调高不染巫峰雨。龙髓生霞谢露铅，蝉衫如水萦金缕。瀛洲学士老率更，服暗编简谁施媿。平生肝肠忽妩媚，神

气钩画同飞扬。阅晋经唐今几昔，光景常鲜日月白。绍兴天子曾品题，价重珊瑚何翅百。吾闻商雒神灵居，祇今王会临皇舆。原公翊我九畴主，更睹龟呈绿字书。

温州思远楼在北宋时就出名，杨蟠离开温州后，写下《去郡后作》，其中就回忆了此楼，“思远城南曲，西岑古渡头”。思远楼在水心村附近，叶适在此居住，是南宋时温州文人雅士活动的中心。叶适在《醉乐亭记》展现这样场景：“舟艇各出芰莲中，棹歌相应和，已而皆会于思远楼下。”在《雪后思远楼晓望》又提到：“腊尽冻初合，风花江欲平。急从高处赏，已向负前晴。莫与鬢争白，试将身比清。楼头接远岫，历历正分明。”写出了楼之高，景之阔。思远楼为人们秋日登高，寒冬赏雪，赋诗言志的好地方，是温州城市的一处胜景。查阅宋代温州的诗词时，会发现多首有关思远楼的吟唱。

戴栩《次韵水心端午思远楼小集》：众媵容独丑，孤正軋群倾。何必远者思，今古同一情。士方慕洁修，各以好自萦。一旦履华臙，争夺遗世名。梟獍随诋凤，蝼蚁起困鲸。醉中触灵均，到今唤不醒。朋社角曼衍，冶游眩轻盈。无情湘水窟，有恨

郢山棱。

戴栩是应叶适的《端午思远楼小集》而酬唱的，叶适原句为：“凭高难为观，楼居势尽倾。思远地不远，空复生遐情。上惟山绕围，下惟溪环萦。此实擅清境，岂以旷朗名。土俗喜操楫，五月飞骇鲸。鼓声沉沉来，起走如狂醒。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气盈。衰翁茧帐卧，南风吹作棱。”

曾官居枢密院兼参政的许及之，也写过思远楼，有诗《次韵常之五日禁竞渡》：仍年此足为吾病，举世谁人似我闲。思远楼前重禁渡，容成洞里独看山。交游雨绝梅还溽，赓倡星分稿自删。赖有松庐相慰藉，新篇时复到榆关。

曾两次官桂林的朱晞颜（1132—1200），为未待问榜进士出身，在温州不仅写下长诗《游江心寺》，留下“帆樯潮汐聚凫雁，钟梵昏晓惊鱼龙”的名句，还在思远楼留下一阕词《喜迁莺 永嘉思远楼端午》，其中“彩鷁浮空，鸣鼙聒昼，十里翠红相接”是思远楼在端午节日里最好描述。至于朱晞颜何时到温州，到温州

有何公干，也是值得研究的，谨录思远楼词如下：香尘盈篋。是旧日赐来，宫罗叠雪。服艾衣清，浴兰汤暖，输与个人娟洁。性巧戏拈针缕，蹙得虎儿狞劣。鬓半髲，贴朱符翠篆，同心双结。愁绝追楚俗。独吊湘累，日映沉菰叶。彩鷁浮空，鸣鼙聒昼，十里翠红相接。漫有倚空栏槛，谁把朱帘高揭。归去也，听叩舷儿女，尚传歌阕。

思远楼不仅有叶适、许及之、朱晞颜、戴栩等名家写下诗文，民间说唱和戏曲也留下诸多唱词，南戏《荆钗记》写道：“越中古郡夸永嘉，城池阒阒人奢华。思远楼前景无限，画船歌妓美如花。”这戏词中有“越中古郡”四字，是对温州的地域恰当的定义。东瓯，乃是越中之古郡。

戴栩是继叶适之后文名鼎重的学者，温州城内的思远楼、江山胜概楼、三十六坊，是当时名楼和中心街巷，戴栩都留下城市历史的标识性诗文，他可谓名城里的名人。

（作者系《温州市志》主编）

从泰顺古籍《之官纪行》看宋代官员 差旅文化

◇ 陶洪宇

《之官纪行》是泰顺先贤吴骥（1167—1247）在嘉定九年（1216）赴任昭州知州途中的行记，它在地方志书《分疆录》《泰顺县志》中被称为《宦游日记》。该书以行记的形式，记录了南宋官员吴骥赴任期间的旅途交通、自然环境、地理物产、人文历史、社会风貌等诸多情况，这种直观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分析《之官纪行》记录的内容，对了解宋代官员赴任旅途的情况和宋代官员差旅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之官纪行》及其研究价值

行记作为古代散文中的一类，多数记载的是作者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的人文、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以及自身体验的文章。自宋代起，随着交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出行的机会逐渐增多，行记这类文体的数量与质

量也得到较大的提升，其中有不少是一些官员为记录差旅活动而留下的。如陆游《入蜀记》、欧阳修《于役志》、郑



吴骥像

刚中《西征道里记》、范成大《吴船记》和吴骥《之官纪行》等。学界在研究这类行记的时候，对其中自然环境、交通、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较多关注，却少有针对其记录官员本身的差旅活动进行探究。《之官纪行》与《入蜀记》《于役志》等作品相比，它在反映自然环境、交通、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同样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尤其是对于研究古代官员差旅活动来说，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之官纪行》按照行程分章，按日分段记载，正文收录诗40首、词1首，附录收诗3首，外附录收诗1首，全文详细记录了嘉定九年吴驂赴任昭州知州的整个行程。当时吴驂五十岁，携子吴彪、吴廌同行，从安固库村（今泰顺库村）启程，往西过江西，再经湖南，南下进入广西，进抵静江府，最后到达广南西路的昭州。除去从静江府至昭州最后几天的旅途没留下文字记录外，自八月初五从库村启程至十一月廿二日抵达静江府，累计三个月十七天（107日），都有文字记录，字数达6788字。相较于欧阳修《于役志》（五个月零二天1744字），吴驂的《之官纪行》记述内容更加细致详实，比如对途中经过具体地点与路径的记述就明显详细得多，诗作的数量和质量也都很好。由此，吴驂《之官纪行》可以成为研究南宋官员差旅文化的重要材料。

二、吴驂差旅中的交通方式

库村与昭州（州治在今广西平乐县）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吴驂选择的路线是先东北至瑞安县城，而后西北至衢州，自衢州入江西，一路向西，自醴陵入湖南，再南下，由全州入广西，达静州府后再转至昭州。吴

驂此行的交通方式以陆路为主，除了在浙江境内有两次水路记录，剩下的只有在赣江走过一次水路。

浙江境内的两次水路，分别是江口村至瑞安县城、从温州城到处州城这两段。宋代飞云江流域航运相对发达，吴驂从江口村启程走飞云江水路，在当时是不二之选。至于温州城到括州城这段，即便行程方向与瓯江水流相逆，吴驂仍选择溯游而上，走瓯江水路。这种选择除了得益于宋代相对发达的内河水路交通外，另一个原因便是当地山路非常崎岖，费力又费时。吴驂之后在括州至衢州途中也言：“才踰善岭又摩诃，借问化城路几何？”“自上三衢路不平，冈峦竟作太行行。”宋代即便有驿站为官员出行提供一些服务，但是与中原平坦的地形相比，江南地区起伏的山势使得远途出行颇为不易。另外，吴驂在莒江江口村启程时提到“至江口村，备舟十二只”“彪、廌二儿随任”。虽然文中所述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个儿子，但是从十二只舟的规模来看，行李不少，且还有其他家眷，所经过的浙江西南山区，地势崎岖，驿道简陋，没有大规模、长距离的石砌道路，较多的是狭窄的“草路”。由此可见，走陆路就属于不太



庫村居址形勝之圖

理想的选择。出浙江后，吴驂仅有一次水路记录：“（十月）初六日早，发江上。”此时，他正在从洪州丰城县往临江军前行，选择乘舟，最后在灵塔埠上岸。丰城县与临江军两地海拔相差不高，赣江此段水势较为平稳，吴驂因此写道“风细波平，舟中欢饮”。另外，他在初五的日记中提到：“指挥为差大船二只”，洪州州军指挥使为他准备了两艘大船，这也符合当时公务迎送中知州允许配船二只的规定。有了配船的便利，加上水流平稳，致使吴驂选择水路前行。除此之外的行程，吴驂都选择了陆路，原因除去路上涉及的信江和赣江的多段水路较为曲折、效率远不及陆路的外，大概还有其子吴彪不善坐船的缘故。

至于陆路，两宋官府对官员公务出行的规定较为严格，一般由沿途的驿站提供驿马，如果驿站无马或马匹不够，则允许官员雇佣私人马匹或驴作为代步工具。出浙江后，吴驂旅途的大部分路程都是陆路，但他没有提及具体的交通工具，只

有在他的诗中偶尔提到骑马的经历，如“马嘶杨柳双旌下，人入烟云九陌中”“回首黄花送客程，寒梅又衬马蹄轻”等，除去从静江府至昭州最后几天记载空缺外，吴驂此行沿途一共投宿了24个驿站，其他时间则投宿民宅、店铺等，甚至有时候只能借宿桥中，如“（十月）廿六日，宿师姑桥”“（十一月）初九日……抵永州郡，宿城外接履桥中”。

由此可见，在宋代，中国南方地区的交通设施已经比较完善，建设了一定数量的驿站，开辟了许多的航道、渡口，官员外出时的交通方式也有多样化的选择，即便一些偏僻的地方交通条件有些落后，官员们也能够进行灵活的变通，来保证自己公务出行的时效性。

三、吴驂差旅中的文人活动

有别于监察官的公差，宋王朝对于一般类型官员的赴任、离职的管理并不严格，行程时间限制较为宽泛，这为官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许多便利。这也是他们积累人脉、增广见闻的良机。吴驂《之官纪行》就形象地反映到这一点。

（一）迎送宴请

吴驂在处州与知州饮酒时曾作诗道：“江湖远宦嗟行路，山水新诗解宿醒。”受人款待、宴饮赋诗是旅途中的乐事。吴驂赴任途中一共受到过9次宴请，其中多数为各州知州，此外还有提刑、县令、亲戚、当地大户等。如他在处州曾2次接受吴知州的宴请：“（九月）初四日，括守即莲城堂中设宴相款，并以诗赠。”“（九月）初九日，重阳节。（括）守复设宴是堂。”又如在江西新喻县，受到县令以及新喻人李提刑的迎接与款待。吴驂在受到宴请招待时往往会在该地停留数日，如在处州曾停留9日。在衡州拜访赵提刑、徐提举等人后遭遇大雪，停留3日，饮酒作诗，吴驂自己也觉得“馆中拨闷”，赋诗道：“卧雪袁安不出庐，我行欲进亦趑趄。”在湖南永州，也寓居永州衙内2

日，与时任永州知州的温州同乡人徐某某饮酒赋诗。

“迎新送故”是宋代官员赴任、更替、离任途中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完善的迎送制度在《之官纪行》中也多有体现，吴驂任昭州知州，沿途为其迎送的也多为同级别的各州知州、知军等官员。在洪州丰城县，州军指挥使其差遣两只大船，以供其至临江军所用，对此吴驂十分欣慰，面对士兵“推车运米，其声可听”的场景，他感慨作诗道：“全凭机轴自流行，可悟优游德化成。”此外，他还忆起处州知州所赠诗句“牛斗射丰城”。这些都足以看出途中官员迎送之频繁，也给吴驂奔波劳累的赴任之旅带来精神慰藉，留下美好回忆。

（二）游览名胜

吴驂赴任途中多次观光览胜，《之官纪行》中的大部分诗词都是记录这些内容。他在旅途中不放过任何一处自然景观，并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融入诗句中。如八月廿四“访容城太玉洞”，“廿五日……是日，宿江浒望孤屿”。留下了“屢水茫茫寄短桡，夜看孤屿耸云霄”的诗句；在温州江心寺与寺住持探讨佛法时一度不得真谛，直至夜里明月升起，大潮奔涌，吟出了“明月一轮出自静，长风

万里浪非遥”的诗句，充满禅意；八月廿八日乘舟至青田县石门洞，更是发出了“千寻飞瀑悬银汉，万古名山此石门”的感慨。此外，旅途所经的浙、赣、湘、桂各地的许多人文景观，也留下了他的痕迹。在温州，他游飞霞观、江心寺；经信州，游治平洞张真人修炼处、祥符寺；经弋阳县，拜访应相国墓；到清江桥驿，游道观；过宜春，游灵济、孚惠二王庙；在祈阳县路上，游语溪、问津亭等。其中，不乏对妙景的称赞，如在信州时描写治平洞气势的诗句：“地合仙凡弥扰混，峰分龙虎径跻攀。”以及写出许多有深度的凭吊古人的诗句，如祥符寺中观赵中定碑亭时作的诗句：“名与此碑具不朽，凌烟何必画衣冠？”此类内容极多，不一一赘述。

总之，《之官纪行》揭示出了文人交游和访景览胜是宋代官员公差旅

途重要活动内容，二者除了可以为旅途增添情趣，也能为官员增广人脉和见闻。它也真实反映出宋代官员差旅途中的生活状态，体现士大夫闲适与从容的精神状态。

（作者单位：湖州学院）

参考文献

1. 《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黄纯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
2. 《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阮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3. 《泰顺历史三千年》，陶汉心，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9年。
4. 《宋代地方政府公务迎送制度研究》，胡明颖，2018年。

隐藏在泰顺方言深处的历史记忆

◇ 陶汉心

人类是淡忘历史的动物。古往今来，曾经是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曾经是经天纬地的风云人物，最终或许都会被世人遗忘。但是，有一样东西，它能永久地承载着历史。它是历史的“活化石”，是“无字天书”。它在漫长的时空中，经过口耳相传，顽强地保持着对历史的最本真记忆。这就是方言。

泰顺方言也不例外，其中不乏有一些词汇，至今仍保留着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朴素记忆。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现象，就是通过方言，保留下依稀的记忆，成为今天泰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

“食菜”，指“吃斋拜佛”。泰顺蛮讲话、彭溪闽南话称“吃斋拜佛、出家当和尚”为“食菜”。“食菜”取自“食菜事魔”前两字，意义与“食菜事魔”相关。“食菜事魔”是宋朝统治者对“摩尼教”（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世界性宗教）

的诬称。因为宋元以来民间常以摩尼教组织起义（如北宋方腊起义），所以宋元官方就将摩尼教的“摩”字讹为“魔”，诬称之为“魔教”。又因其信徒吃斋的特点，故诬蔑它“食菜事魔”。摩尼教大约在五代时期由福建传入温州，最迟在宋代已传入泰顺境域。元朝至正年间，青田八都（今文成县黄坦一带）盐贩吴德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起义，以泰顺北部和黄坦一带作为根据地，“列寨百里，首尾联络，（官兵）不敢深入”，前后历时五年，势力波及温、处、婺以及福建部分地区。另外，泰顺是一个移民成分复杂的地方，历朝历代不乏有福建地区的人口迁入泰顺（尤其南部乡镇），加上泰顺民间传统释道不分，道教的神仙也好，佛教的菩萨也好，各种地方俗神也好，民间统统叫作“佛”。而且摩尼教和佛教的信徒都吃素，所以民间久而久之，就将吃斋的、拜佛的，称为“食菜”。

“自挂梅”，表示“同情”“可怜”“怜惜”。泰顺境内，不管是哪种方言，说某人（或某动物）可怜，都用“自挂梅”一词，当然有些方言发音为“罪过霉”。“自挂梅”三字，就是源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这件事。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在北京景山（又称煤山）一颗歪脖子的梅树上自缢身亡。由于崇祯皇帝是一位怀着图强中兴愿望的君王，他的不寻常死亡，激起民间的普遍同情，尤其在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引起的震撼更是无比巨大。之后，世人把崇祯皇帝吊死这一事件称作“自挂梅”。这就是“自挂梅”成为“可怜”一词同义语的原因。

“李爷”，形容“霸道”“专横”。明末清初时期，是天崩地坼的时代，人心异化，统绪失控，老百姓盼望改朝换代。“三山（福建）出天子，东瓯（温州）成战场”。南明藩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号“隆武”；温州地区群雄并起，战火连绵不断。其中，有一位民变首领，名字叫何兆朗，最为残忍毒辣，跟其同党、泰顺雅阳人李珏关系不和。后来，这个李珏投靠了盘踞在福鼎沙垵

港的海寇黄明，并设下计谋，诱杀了何兆朗，从此横行一方，作恶多端。所以，泰顺雅阳老一辈人的方言中仍有“李爷”这一词语，用来形容某人横行霸道。

“明朝人”，形容“保守”“孤僻”“顽固”。明代基层社会实行里甲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徙，泰顺广大劳动人民被强行控制在土地之上。

“斯民仅安耕凿，寂无显者”，这是当时社会的苦寂、沉闷的真实写照。在明代，朝廷为了防止倭寇入侵，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禁止“片板入海”。在这种极端政策的作用下，加上受程朱理学思想的控制，泰顺社会逐渐转向封闭，人们的思想趋向保守与僵化。泰顺方言中有“明朝人”这一词汇，包含“保守”“不合群”“不懂世故”“孤僻”“死脑筋”“顽固”的意思。究其词义起源，大概与明代泰顺社会保守、封闭有关。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明代泰顺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洒脱、雍容、豪迈的气概，像明末秀才包世昌、董应科、张鹏来、周显殷等人似乎都有一种自我虐待的心理。包世昌（1606—1671），泗溪玉岩人。明朝灭亡后，他独自住一小楼，穿戴明朝旧衣冠，拒绝剃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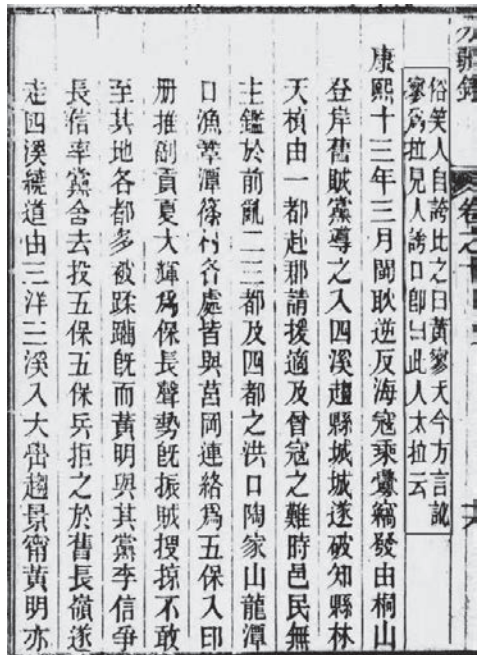
留辮，終日正襟危坐，拒絕下樓，堅持腳不踩清朝土地，前後十餘年，直至病亡。無獨有偶，還有羅陽平溪人董應科（1606—1677），明亡以後，也是採取這種方式，表達了“頭不頂清朝天，足不踏清朝地”的意志。他“坐臥一小樓者二十餘年，不與世事，服舊衣冠以終”，曾撰聯句“明月雖然落，清水不為混”，表達對舊王朝的忠貞，對新王朝的不順服。明末泰順知識分子這種怪僻的行為、自我封閉的心理，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沉寂而僵化的特徵，體現了頑固保守的社會大眾心理，展現了頑固、保守、孤僻的“明朝人”形象。

“郎罷”，多用於指責兒子、正告對方時的狂稱，或有“阿爸老子”的意思。該方言詞彙存在於泰順蠻講方言。舊時閩俗，稱父親為“郎罷”，稱呼兒子為“囡”。“郎罷”兩字最早見於中唐詩人顧況（727—815）的詩歌《囡》中。唐朝大歷年間，顧況出任溫州“榷鹽官”。其間，他相繼寫下《囡》《仙遊記》《莽墟賦》等詩賦文章。其中，《囡》這首詩，採用白描手法，控訴了福建地方官府捕掠兒童閹割後“買獻之於朝”的惡劣行徑。詩中，以父親的口氣控訴道：“郎罷別囡，

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丟棄不養）。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又以兒子口氣控訴道：“囡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另外，顧況寫的《仙遊記》《莽墟賦》，讲的是溫州人李庭入山伐木、奇遇世外村落的故事，反映了唐朝前期溫州上游近福建邊界（泰順）等地的移民開發情形。由此推測，從唐代或更早時候開始，“郎罷”就是泰順先民常用的方言詞彙。當然，“郎罷”作為古老的方言詞彙，在流傳過程中，它的使用場合和詞義漸漸發生了變化。“郎罷”一詞，在《囡》詩中就有兩種用法，用作自稱，如“郎罷別囡，吾悔生汝！”，有指責和正告的意思，從古至今，這種用法得到強化，所以今天泰順蠻講方言中，“郎罷”引申出“阿爸老子”意思；而用於他稱，如“囡別郎罷”“不得在郎罷前”，這種用法隨著時間推移，已漸趨消失。

“拉天”，表示“吹牛”“說大話”。泰順多數方言（彭溪閩南話除外）形容某人说大話，就说这个人“拉天”，或者干脆将其比作“黄拉天”，或者称之为“拉天牯”“拉天八怪”。“黄拉天”，其实是清朝顺治十四至十七年间（1657—1660）

在泰顺、寿宁、柘荣等地作乱的民变首领。至于他是哪里人，志书已经失载；关于他的名字，有的志书记载为“黄寥天”“王捞天”“王掠天”等等。相传，黄拉天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喝酒，爱说大话。据民国《霞浦县志》记载，黄拉天早年在柘洋（相当今柘荣县）当过铜匠，铜铜时因用火不慎，烧毁房屋的廊柱，被迫向主人家赔了钱，他的内心从此埋下泄恨于世的孽根，后来就干脆“入草为寇”，成为民变首领。从出身与境遇来看，他跟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有着离奇般的相似！据泰顺《分疆录》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黄拉天和马云龙聚众造反，率领部众数千人屯驻泰顺县松垟上仁寨与泗溪等地，流劫附近各乡村。第二年（1658），黄寥天、马云龙势力更加猖獗。为此，莒江秀才夏应凤、副贡夏大辉组建了乡兵，并配合官军，对黄拉天、马云龙的民变势力展开军事清剿。不料莒江乡兵不敌，黄拉天的人马冲入莒江村，在当地烧杀掳掠，莒江男女老少六十余人遇难。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官军、乡兵合力围剿，黄拉天兵败战死在司前杨寮。他死后，泰顺民间没有忘记他，就用“黄拉天”三字代指“说大



《分疆录》书影

话”。到了后来，黄拉天的人物形象及其所作所为渐渐被人淡忘，但其名字却被定格下来，成为泰顺以及景宁等地方言中的一个词汇。

“咀哩咕”系方言中的拟声词，用于恐吓人。该词汇跟“长毛反”（太平天国运动）有关，曾经流行于泰顺北部。过去司前等地农村，要是碰到小孩子不听话的，老一辈常常会讲“长毛反”杀人的故事，有老人甚至会模仿“长毛”士兵样子，呼喊“咀哩咕”三字，并且用手在小孩腋窝处抓痒，使小孩子们很害怕。据志

书记载，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杨辅清的部队分别从景宁、寿宁县逼近泰顺。当太平军攻破云和、景宁后，清兵和地方乡兵从景宁等地溃散南逃，纪律败坏，沿途抢掠，一片哗然，远近震惊。民间传说，太平军乘胜穷追，四处搜捕溃败出来的清军和乡兵。太平军士兵多来自广西，一旦发现乡兵和清军的游兵散勇，他们就用广西方言大声疾呼“咀哩咕”，即“这里（有）个”，意思是这儿发现一个敌兵，大家快点过来把他拿下。

“杭州”，是形容惊讶、痛苦的开头语。世界各种语言都存在“喊天”“叫地”的现象，泰顺北部方言（不包括罗阳话）表示惊讶、痛苦时除“喊天”“叫地”外，还存在叫“杭州唉”的现象。为什么要以“叫天”“叫地”“喊my God”“叫杭州唉”表示惊讶与痛苦呢？笔者推测“天”“地”“my God”“杭州”都是大的东西，以大表示严重，以突出惊警。杭州作为大城市、大地方，在宋代尤为突出，它是南宋的首都。关于这一点，已经深深地植入泰顺的方言记忆中了。南宋时期，泰顺虽未建县，但其文明开化程度与文化发达地区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泰顺所在区



太平军南下

域学风鼎盛，文化思想活跃，学术人才辈出，科举文运高度发达。其中，仅文、武进士两项，南宋时期泰顺境内就有75人中举。如泰顺人、南宋名臣林待聘就竭力要求宋高宗在杭州建立太庙，最后被高宗皇帝采纳，这对于促进成南宋王朝定都杭州起到积极作用。当时杭州与泰顺陆路距离大约1000华里，“近水楼台先得月”，泰顺的士子、宦宦人物是真真切切见识过杭州城市的繁荣与博大；相反的，对于西安、开封、南京、北京，就没有这种感觉。近现代以来，上海崛起，成为全国最大城市。泰顺方言表示惊讶、痛苦时，则加上“上海”二字，如“杭州唉！上海唉！”

“同志人”，指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该词汇流行于泰顺南部方言区（彭溪闽南话除外）。泰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浙

南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全面抗战时期，是浙南党组织活动的基本区。泰顺老区的人民群众对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充满着诚挚、友爱之情，往往称之“同志人”。解放后至今，老百姓习惯地将脱产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作“同志人”。

“电火”，指电灯。流行于泰顺南部方言区（包括彭溪闽南话）。解放前泰顺没有电力设施，居民普遍使用茶油灯、菜油灯，甚至火蔑、松明来照明。所以，泰顺民间谚语有“火篾当灯草，火笼当棉袄”的说法。至1953年，百丈口街尾创办了泰顺县首座以木炭为燃料的火力发电站，为当地居民提供照明用电。当时，电灯刚出现在泰顺山区，老百姓对电灯的发光原理缺乏理解，认为凡是灯光都是靠火烧出来的，所以把电灯称为“电火”。

“白粉墙”，指泗溪镇政府驻地村。泗溪白粉墙一带，宋朝以来一直叫“莘阳”。明末清初，泗溪成为事实上的战乱策源地，沈可耀、马云龙、黄拉天、黄明、李信率领的各类民变武装以及海寇势力反复在此流劫或屯聚。因为屡次遭受兵燹，泗溪等地民间建筑被破坏殆尽，莘阳村“惟



白粉墙村旧照

市亭粉壁仅存”。后来，人们干脆将“市亭粉壁”以及所处的地方并称为“白粉墙”。于是，白粉墙的地名就这样产生。

“备刀”，指罗阳镇三滩村的一个小地名。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攻下景宁。为了防止太平军由景宁上标一带进入泰顺，泰顺乡绅潘明全等人慷慨捐资，在岭北建成龙岩岭关隘、风门坳关隘，由监生周树椿带领团丁进驻隘口日夜防守。其间，三滩等地村民也开始磨刀霍霍，准备给“长毛”迎头一击。三滩有一处小地名叫“备刀”。相传咸丰年间，村民为防御太平军曾在此磨刀备战，此后该地点就叫“备刀”。

〔作者单位：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记冯增荣同志峥嵘曲折的人生

◇ 安邦

2022年7月26日，我尊敬的领导和战友冯增荣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为追忆其峥嵘曲折的人生，特以此文悼念。他只长我两岁，却比我早十年参加革命。他经历丰富，道路曲折，人生多彩。

一、峥嵘岁月

冯增荣，永嘉城区（今属温州鹿城区）人，1925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席厂职工，母亲是针织厂工人。他家从1942年开始，就是地下党的交通站，接待和掩护地下党工作人员往来和住宿，风险极大。三个弟妹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1949年2月，国民党特务以“共产党嫌疑”的名头逮捕了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对他们刑讯逼供。母亲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弟弟表现亦十分坚强，敌人找不到一点证据，后经党组织营救才得以释放。母亲出狱后，立即送儿子投奔游击队。

温州是一块有革命传统的热土。1924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永嘉城区建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运动。国共合作，党动员组织人民迎接北伐军进入温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温州地区共产党人遭到残酷屠杀。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崛起，革命浪潮席卷浙南20余县。红十三军失败后，以“温独支”成员叶廷鹏为首的共产党人，组建中共浙南委员会，建立红军游击队，发展党组织，创建瑞平边一块秘密游击区。1935年刘英、粟裕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闽边，汇合中共闽东地委和浙南委员会及其领导武装力量，经艰苦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同时，温州城区学生奋起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增荣同志就在这样革命环境成长起来的。

冯增荣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2年春上明德小学，在校期间，成

绩年年名列前茅，获得同学爱戴和老师赞许，选他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及纠察团团长。他从小喜爱书画、文学，这是受他三舅舅影响。三舅舅是个自学成材、敬业开拓之人，爱好书法文学，收藏大量名画、碑帖和书籍，闲时教授少年增荣书法，带他阅读古典著名小说，把他引入艺术的殿堂。明德小学有开设书法课，也经常举办书法展览，他在学校书法比赛中亦是翘楚。在初中读书时，师从温州著名进步板画家张明曹、金逢孙学画，因而他的书画基本功都受过规范训练。林朝胥是他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级任老师，是个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他在课上声泪俱下地介绍九一八事件，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之悲痛和义勇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在课下还指导学生阅读鲁迅、邹韬奋的著作和进步报刊，在孩童的心里播下抗日救国的种子。他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和沈志远的《妇女社会科学知识读本》为教材，向学生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向学生讲解《统一战线指南》，为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打下基础。受其教育，童年的增荣就立下报效祖国的宏愿。1935年冬，小学四年级时，他就

积极参加温州城区学生和市民奋起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推动同学一起参与。8月，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任命他为该团的少年儿童组组长，参加少年先锋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温州中学初中部。入学后，他参加了永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以其书法、绘画、文章和表演才能作武器，参加街头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9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两次下厂、下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校内参加进步学生组成的九月读书会（后改名五月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1939年8月，由于他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党组织破格提前两年吸收他入党。1940年4月，温州中学第一次建党，增荣当选为支部委员；6月，提任支部书记；8月，由于党组织迅速壮大，成立中心支部，选他任中心支部书记。在校期间，通过竞选，他将党员和进步同学选上学生自治会主席、理事长、各部门和主要社团负责人，掌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有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春，增荣脱产调任永嘉县城区区委宣传委员，不

久提任区委书记。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掀起反共逆流，浙南全党正在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革命活动都转入地下。城区区委机关转移到江北龙桥小学，以教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下，增荣冒着生命危险，经常秘密潜入城区，深入工厂、学校做群众工作，巩固革命阵地。在温州第一次沦陷时，他和党员、进步青年转移到郊区农村，发动农民准备武装抗日，那时他才16岁。1942年2月8日，浙江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革命环境进一步恶化。奉组织指示，他潜入国民党浙江缉私处，以后几年与魔鬼共舞，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抗战胜利前夕，他回到浙南特委。1945年10月，特委决定重建永嘉县委，任命他担任县委委员、宣传科长，不久兼任泽临区委书记。县委研究恢复城区党工作时，他提供了原温州中学秘密发展、单线联系、长期隐蔽在城区坚持斗争的名单，这有力帮助县委书记曾绍文开辟温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之后，他还几次随曾绍文同志秘密进城，参与指导学生运动和成立温州回乡大专学生联谊会（简称温州大联）等工作，引导温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

1947年6月，特委决定重建城区区委，任命冯增荣为区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冷静处理好8月11日夏文俊被捕后温州大联停止活动、疏散并隐蔽领导成员与积极分子。自己仍活动在险情丛生的城区，按特委指示多方设法营救夏文俊出狱，并协助党员与学生骨干撤退至游击根据地。9月，他在温州多所中学建立支部。他还在城区进一步建立交通站，接待和输送京、沪、杭进步学生到游击根据地。1948年1月，特委决定成立江北中心区委，调增荣担任中心区委书记。江北中心区是浙南地区西北部的门户，南临瓯江，西逼丽水县城，北抵缙云边，东接瓯北县永临区，钳控瓯江这一重要命脉达二百余里。中心区委的任务是：巩固老区，开辟新区，以老区为依托，扩大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解放青田、支援温州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军温州做好准备。上任后，增荣立即召集区委成员李川仁、杨进尧、陈鸣皆、潘如楷等开会研究如何完成上级党决定的任务。中心区委下属万山和雁店两个区委，前者为老区，后者为新区。他们决定由增荣和陈鸣皆两同志负责万山区工作，增荣兼区委书记；李川仁、杨进尧、潘如楷负责雁店区

工作，李川仁、杨进尧任区委正、副书记。增荣先抓万山区工作，大力培训干部，整顿支部，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军，一方面建立区委武工队，另一方面向浙南游击纵队所属的在这地区行动的十三区队输送兵员。同时发展民兵，打击地方反动分子，消灭国民党乡、镇武装，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妇联会及儿童团，使老区得以巩固。然后，他率领区武工队进入新区，配合李川仁、杨进尧工作。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抗租斗争，然后建立农会，组织民兵，使新区面貌发生深刻变化。1948年底，工作很快向青田县城推进，形成包围县城的态势，并在县城里开展了秘密工作。

1948年10月8日的黄垟战斗和11月12日的项底战斗，增荣率领区武工队，发动民兵和革命群众参战，有力地配合十三区队英勇作战，打败几倍于我的敌军兵力，成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1949年4月，特委决定重建青田县委，增荣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在温州城和平解放时，他率领武装部队支援浙南游击纵队，后配合解放军二十一军先头部队和浙南游击队纵队第二支队，5月13日

解放了青田县城。

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温州市文教局局长，曾兼任永嘉中学校长，后调任省教育厅中教处副处长，在教育战线上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智、德、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方针。他经常深入教学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学习苏联教学经验，他还自学俄文，翻译苏联中等学校教材，编辑《中学工作通讯》，有力促进中学教育更好发展。

二、人生第二个春天

1980年，冯增荣已经55岁，组织上根据其愿望，分配他到省文联工作。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以高昂斗志，满腔热情，忘我劳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筹备恢复东海文艺出版社，创办江南文学院，又参与创办《江南》大型文学杂志，并主持编辑部工作。他还利用疗养的时间，花几个月临摹《圣教序》，强化基本功训练。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和书画作品，在《人民日报》《温州日报》《桂林日报》《江南》《清明》等多家报刊发表，成为极有影响的作家和书画家。

1983年，他因病提前离休，却离而不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省

老年文学艺术事业上，推进老年书画事业的发展。他参加筹建省老干部书法协会并任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文联老艺术家书画社副社长，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主编《苍松书讯》、创办书法研究班，还在省老年大学教授书法多年。先后出版了《感情之风》《风雨情缘》（与方家溪合著）、《真虹诗选》和《真虹小诗》四部诗作，《生之痕》《生之痕二集》两部散文集，《冯增荣书法集》《冯增荣书画集》等。他的哲理诗，《桂林日报》辟专栏发表，连续10年不辍，在西南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寓言诗入选《中国寓言大系》；抒情诗也得到文艺界很高评价。《感情之风》发行时，温州市永嘉中学广大师生急于拜读，校长特写信给增荣，附上一张名单，希望各人能得到一册。我也很爱读他的诗作，特别是新诗《街灯》：“为了夜行者，宁愿走出辉煌的大厅，在冷风中，一站就是一生。”和《仰怀王公十朋》七绝：“代代兴邦有直臣，千秋磅礴是冰心。沧桑泣血诗魂苦，酬有苍生月一轮。”他有很多集句诗词和用名家名诗名句为友人题写对联，其难度不亚于创作。如七绝：“半壑丹枫明似火，何领四季逐风流。一樽且买他乡醉，俯仰人间浩

荡秋”。句句精美，紧扣主题，平仄音韵，严符格律，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他曾赠我一幅隶书对联，摘用苏东坡诗句：“树含烟火明又灭，石碍飞泉咽复流”。十分贴切我的经历，令人奋进。他的散文集中《泪光中的歌》，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征文一等奖。《生之痕》《生之痕二集》两书先后发行，专家有很高的评价，社会反映十分强烈。如《生之痕》发行后，原温州鹿城区委党史办公室董明同志来信说：人人含泪阅读，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主题。《生之痕二集》发行后，曾任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原浙南游击队员李杰华对我说：“感人肺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冯增荣的诗词散文所以有这么大的感染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浓厚的乡情。他所写的山是浙南的山，水是浙南的水，人是浙南的人，事是浙南的事。很多读者说这些作品是以文艺形式写的浙南党史资料；（二）书中反映的都是增荣同志的亲身经历，他与书中的人物共生死、同患难、同命运、共呼吸，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是血和泪凝成的文字；（三）反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

党的赤子之心；（四）具有很高文学修养，丰富的想象力，清新的构思和优美的文字。

冯增荣的书法作品，为人推崇，屡获大奖，广为收藏。楷书作品获全国首届规范汉字楷书一等奖，隶书作品被中国国际文学艺术作品博览会评为特级品，行草作品获新加坡“醒狮杯”特等奖。其中，草书作品，势如飞瀑直下，动似夏云幻变，力像惊蛇入草；字的欹与正、开与合、高与低、大与小、疏与密，线条的断与连、粗与细、轻与重、快与慢、刚与柔、浓与淡、湿与枯，像朵朵云彩，组组图案，曲曲乐章，错落有致，有节奏地构成美妙的篇章，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冯增荣的国画，手随心意，寥寥几笔，或水仙、或荷花、或松竹，或梅兰、或日月、或云天、或江湖、或雄鹰、或仙鹤、或飞雁，或野鸭、或小鸡、或啼鸡，栩栩如生，跃上纸面，立意高远澹泊，风格素雅清新，给人另一种艺术享受。他的篆刻，无论是朱文白文，都古朴秀丽，令人喜爱。尤其那方“墨痕”朱文白文巧妙结合，是件匠心创造的金石佳作，令人惊叹！还有一块长方形《时事周报》朱文印章，是增荣1947年春季的

作品，非常宝贵。那时永嘉县委机关和特委机关一起行动，在战火纷飞中进行整风学习。整风结束后，增荣参加特委宣传部编辑《新民主》半月刊和筹备特委机关报《浙南周报》（开始时称《时事周报》）。《时事周报》于五一创刊，是张十六开八版的油印小报。我担任首任编辑，报纸编好、刻写、油印后，再在报头套印鲜红色的《时事周报》四个楷书字。字是洪水平书写，由增荣用一块硬木刻成长方印章。就是这张油印小报，像一道闪电，划破浙南黑暗天空，振聋发聩，成为唤醒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块印章具有重大革命历史意义，可惜未能入编《冯增荣书画集》。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杨涵，曾为《冯增荣书法集》写了“霜天晓角”的题词，对他的书法作了科学评价：“书道，出之秀，归于朴，似玉，风韵足，不须雕琢。”我想同样也适用他的国画和篆刻。

冯增荣晚年十分关心浙南游击根据地历史研究。他曾担任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南分会副会长，长期主编《浙南火炬》期刊，主编《龙跃纪念文集》《括苍一兵》等。他积极参加浙南游击根据地历史重大课题研究，并发表多篇文章，歌

颂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牺牲的烈士、刑场上横眉冷对敌人枪口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和革命根据地人民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他还为浙南各县市题写革命纪念碑、匾额和对联，为各地方文献题名、为战友回忆录作序、题名。他亲自为我撰写的《温州地区第二条战线史》书稿进行精心修改、

并作序；还多次参加我编写的《浙南人民抗日斗争史》研讨会，并题写书名。据不完全统计，他所作的序言、题名、匾额和对联有上百件之多，这充分说明他热爱浙南党组织、热爱浙南游击根据地人民、热爱共同战斗的战友。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退休教师）

公益广告



浙南农民“老大哥”——叶廷鹏传略



叶廷鹏，浙江平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积极组织领导浙南农民运动，被当地群众尊称为“老大哥”。曾任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书记、浙南特委委员和农运部长等。1941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在平阳英勇就义。

叶廷鹏，1889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迎学垟村一户贫苦农家。他急公好义，敢作敢为。1924年，浙南地区发生粮荒，当地有地主囤积居奇，穷人买不到粮食，怨声载道。乡亲们公推叶廷鹏与之交涉，但地主拒绝将粮食平糶给农民。叶廷鹏就带领民众拦截其贩运外地的粮食，把全部粮食公开平糶给农民，受到当地穷人的拥护。

1926年春，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游馥知道叶廷鹏的为人后，立即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叶廷鹏37岁。此后，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0月，张培农以中央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在平阳开展农运工作。叶廷鹏协助他在环川、小南、万全等地组织农会。1927年2月，万全农民协会成立，叶廷鹏当选为会长。当时，北伐军已经进入浙江。以吴醒玉为首的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叫嚷“党匪不灭，寝食难安”，并雇打手抄了叶廷鹏的家。于是叶廷鹏、张培农等就组织了数千农会会员，袭击了吴醒玉名为“一笑楼”的住宅，给吴醒玉以狠狠打击。这次事件震慑了全县的地主豪绅，有的人称病闭门不出，有的人携家眷避逃外地。从此，平阳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平阳的封建势力勾结反革命力量，向革命人民

进行反扑，叶廷鹏等一批中共党员被通缉，全县农会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着平阳城乡。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1927年6月上旬，共产党员张培农、叶廷鹏、游馥和农运骨干吴信直、林珍等在平阳环川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农盐民武装攻打平阳县城。6月17日夜，他们发动环川农盐民进行武装暴动。但是，匆忙组织起来的农盐民武装，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当到达县城东门外时，有的还在说话，有的甚至取火点烟，因而暴露了目标。守城军警开枪示警。叶廷鹏、张培农等认为已失去有利战机，立即下令撤退，暴动流产。

1928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来浙南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下旬，郑馨召集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党的骨干在瑞安城关开会，决定恢复与整顿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准备武装暴动。会后，永嘉、瑞安、平阳3县先后建立了县委。经过准备，6月27日，永嘉、瑞安、平阳3县农民联合举行武装暴动，决定分四路攻打平阳城。叶廷鹏带领万全300名农民埋伏在东门外柑园，准备攻打东门。不料，被巡夜的国民党平阳守军发现，他们便提前出击。战斗中，

叶廷鹏左肩中弹负伤。为避免损失过大，暴动队伍不得不撤退。进攻西门和北门的队伍得知东门主攻失利，亦立即撤出。准备攻南门的江南队伍由于渡江未及时赶到，途中闻讯便折回。翌日，设在练川下薛村的暴动指挥部被围，游馥、林珍等人突围，林平海、杨公亮等被捕牺牲。叶廷鹏等人的老家又遭洗劫。

叶廷鹏负伤后，由于伤势重，没有随队伍撤退，先后秘密转移多个地方，最后躲到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靠捉青蛙、捣黄泥敷治伤口，拾海藻、挖野菜充饥，历时两个多月。伤愈后，因平阳老家不能回，便到宁波寻找党组织。1930年初，党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到浙南组织红军。叶廷鹏得知这个消息，即赶回温州去寻找同志，与他们取得联系。

1930年2月初，叶廷鹏参加金贯真在瑞安肇平垟召开的中共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他回到平阳农村，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红军行动。4月，他与吴信直一起收缴了江南盐廩的武器，农民武装的装备得到了改善。5月初，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成立。成立后不久，红十三军准备攻打平阳县城。5月23日晚，红一

团和瑞安农民赤卫队700多人会合，进入平阳县境。为配合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城的行动，叶廷鹏和吴信直带领万全、江南农民赤卫队员600多人前来接应。5月24日，红一团和平阳、瑞安赤卫队分别从南门、西门、北门攻进县城。从南门攻入的队伍，收缴了驻在南门土地堂稽查队的枪支，冲入县政府，县长越墙逃走。红军和赤卫队缴获县府印信，释放囚犯。从西门和北门攻入的队伍，原定攻打目标是驻在城隍庙内的省防军，由于向导领错了路，贻误了战机，敌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整个形势发生逆转。加上敌人援军已到，于是敌军重新组织力量，占领城垣，居高临下，疯狂反扑。战斗从上午9时持续至下午3时，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况下，红十三军军部下令撤退。这次战役，红军和赤卫队员牺牲192人，无辜群众遭杀害的达200多人。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县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5月31日，《上海报》对这次战斗作了报道，苏联《真理报》也刊登了战斗消息。

攻打平阳县城失败后，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屠杀红军和赤卫队员。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革命队伍内有些人自首叛变了，各地党组织接连遭

到破坏。叶廷鹏不仅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而且连安身之处也没有，只得东躲西藏。他家接连几次遭到洗劫后，家境很快衰败。之后，他一直在外东奔西跑，无暇顾及家里妻儿的生活，家里常常靠他的弟弟照料和接济。麻步有一个叫陈阜的进步青年，当时担任鳌峰小学校长，得知叶廷鹏的境遇后，将他接去，化名老金，以学校伙夫的身份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陈阜和学校里的进步青年教师吴毓、黄先河、朱程、梅康等，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他们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叶廷鹏等在鳌峰小学的进步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反对，他们勾结愚昧的村民，砸毁校舍，殴逐教师。叶廷鹏等被迫离开。1933年以后，叶廷鹏等足蹬草鞋、跋山涉水，在浙南各地农村秘密串连，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总是对贫苦农民们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共产党像一箩菜籽，只要有土地，撒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只要共产党在，革命迟早会胜利。”

1933年秋，叶廷鹏和平阳江南等地在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隐蔽下来

的一批骨干一起重新组建农会。平阳江南、南港共建立40多个农会，开展“二五”减租等斗争。翌年3月，蒋介石南昌行营根据苍南肥艚乡长的呈报，密令浙江省政府强行解散农会，拿办为首者，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再次遭到镇压。1935年春，叶廷鹏等人的活动中心逐渐从江南等地转移至平阳北港，在北港的风卧重建中共平阳县委。

1935年秋至1936年春，叶廷鹏会同回到平阳的吴毓等人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始称“肃反队”）。浙南红军游击队成立后，除消灭危害乡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惯匪王世雅部外，还先后袭击平阳的国民党北港区署和宜山国民党团访局，击毙国民党区长楼钟声，歼灭当地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数十支。

1936年5月，为适应革命的需要，叶廷鹏等在平阳北港后堡成立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9月，改称中共浙南委员会），叶廷鹏任书记，下辖平阳县委、瑞安县委、永强区委等。并在北港和平（阳）瑞（安）边境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与此同时，叶廷鹏还历尽千辛万苦寻找上级党组织，经过不懈努力，于

1936年夏与中共中央驻上海特科接上了线，并立即给上海特科写了关于中共浙南地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情况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和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十分重视，并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1936年9月，叶廷鹏得悉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达浙南的消息后，与郑海啸到达包垵与粟裕会晤，汇报了浙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活动地区及斗争生活情况，并主动提出接受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1937年3月上旬，刘英率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在冲出敌人的一道道包围圈后，到达平阳北港与叶廷鹏、郑海啸等会合。叶廷鹏向刘英汇报了中共浙南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再次请求接受临时省委的统一领导。为此，临时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浙南委员会，将其所属的瑞安县委和平阳县委合并为瑞平县委，归浙南特委领导，统一领导浙南各县的党组织。叶廷鹏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农运部长。从此，浙南地下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即在刘、粟两人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先河等人曾经生动地比喻，挺进师与浙南地下党犹如鱼水关系一般，彼此不能分离。1939年7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叶廷鹏以来宾身份出

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员实行血腥的镇压。11月5日，叶廷鹏在迎学垟遭到特务的包围，落入魔掌，备受酷刑。他依然坚贞不屈，痛斥顽固派的罪行。6天后，叶廷鹏被“宣判”死刑。国民党顽固派故意把这位浙南地区的农民领袖解往北港水头街“示众”。敌人不给他饭吃，叶廷鹏大声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要死吃饱饭再死！”狱卒理屈，便打了一碗饭给他吃，他连吃3碗后，昂首走向刑场，并利用这个机会沿途演说，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叶廷鹏慷慨激昂，声如洪钟，一路宣传，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顽固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沿途群

众以崇敬、沉痛、悲愤的心情，目送这位临难不惧、慷慨就义的共产主义英雄。

叶廷鹏自1926年投身革命至1941年11月不幸被捕牺牲，在革命生涯中，他组织农会、重建党组织、组织领导攻打平阳城等，为反对压迫、夺取政权、解放全中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为浙南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为此，1954年4月27日，平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叶廷鹏为革命烈士。1956年，平阳县人民委员会为平阳革命死难烈士建立烈士墓，把叶廷鹏的遗骨安放在主位，以供后人缅怀和纪念。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铁军将才——朱程传略



朱程，字公行，浙江平阳矾山（今属苍南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华北抗日民军主要创建人。

历任河北民军第十大队大队长、河北民军第十一大队大队长、河北民军晋冀豫边区办事处处长兼民军第十一团团团长、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和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43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2014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10年，朱程出生于浙江平阳县矾山（今属苍南县）一个贫困家庭。他早年曾就读于温州商业学校，1928

年考入黄埔军校，1929年夏毕业后，在山东德州国民党军队某部教导队当见习教官。旋即因参与反蒋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南京监狱关押一年半。获释后，回到家乡平阳。

在家乡，他经同学介绍，到麻步鳌峰小学任教。该校当时有共产党员叶廷鹏等人从事地下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朱程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他参加叶廷鹏等人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他们的活动引起当地地主豪绅的仇恨，竟唆使流氓地痞捣毁鳌峰小学、驱逐教员。朱程难以立足，便南下广州。在广州住了一两个月，目睹国民党改组派的所作所为与蒋介石如出一辙，又愤而离开。这时他已身无分文，在乘船返回浙南时，因没有买船票，中途被撵上岸。于是他由厦门辗转去泉州安海，沿途风餐露宿、饥渴劳顿，不得已摘吃生柿子果腹，以致朱程的舌头肿痛、不能说话。之后他又大病月余，因无钱就医，几乎丧

生。病愈后，他辗转到了南京，在津浦路警察行政督察总署找到了差事，任科员，后调津浦铁路警察护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任中队长。他在生活安定下来以后，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坚定了革命思想，愈益关心浙南家乡的革命运动。

1932年秋，叶廷鹏等为筹建浙南红军游击队，到南京去找朱程帮助购买枪支。朱程多方联系，于当年冬天秘密买到手枪1支和子弹50发，亲自送到上海交给了黄先河。约两个月后，朱程回乡探亲，又将自己的1支枪和30发子弹借给叶廷鹏。他在南京任职期间，所得工资大部分资助平阳籍的张培农、陈阜、吴毓、黄先河等革命人士。

1933年冬，津浦铁路局派朱程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通知叶廷鹏，如有要紧的事，请尽快派人来商洽。叶廷鹏当时急需在上海设联络点，以便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便派黄先河前往南京，朱程设法为黄先河在上海谋了个位置。后来，黄先河在上海认识了王书圣（即林平），使浙南红军游击队与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

1934年春，朱程赴日本，进入东京铁路学院专攻铁路管理学。他除学习专业课程和补习日语、英语外，

还挤出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注意考察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读了《日本政治机构与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后，认为此书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征服中国的野心，为引起国人的警惕，他翻译了此书。他远在异国他乡，学习和工作十分忙碌，但仍然关心着浙南党的活动。当他得知陈阜在南京被捕的消息，就卖掉了译本的版权，作为营救陈阜的费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与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爱国进步团体新中华学会。1937年5月，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为了参加抗日救亡，朱程未待毕业便毅然提前回国。

回国后，他先到山西太原，被驻在太原的阎锡山的军官教导团教育长张荫梧聘为地形和土木工程教官。七七事变后，张荫梧趁机建立了河北民军，委任朱程为民军第十大队大队长。1938年5月，第十大队并入民军第十一大队，朱程任第十一大队大队长。同年秋，张荫梧率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离开山西陵川县，随鹿钟麟去河北。朱程留任民军晋冀豫边区办事处处长，兼民军第十一团团团长。张荫梧到河北后，不断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残杀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而朱程、闻允志领导的第十一团则坚

持团结抗战的立场，与张荫梧部的行为截然相反，因此遭到张的忌恨。为了便于控制朱程，张荫梧于1939年春调第十一团到河北，并将民军第四团和第十一团合编为第四团，名义上仍由朱程任团长。这以后，朱程加强了与共产党领导的冀西游击支队和冀西党政领导机关的联系，把民军的教导队、少先队送到冀西专署。他还把原民军第十一大队的学员分配到第四团担任连队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战士，以加强对该部的领导。张荫梧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恼火，又以扩编部队为名，决定调朱程去冀南，以便就近处置这支部队。但这一阴谋被朱程识破了。张见朱程不听调遣，便密令民军第五旅吴嘉模部在内丘、邢台之间消灭朱程部。1939年6月15日傍晚，朱程率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从陵川县返回第四团团部驻地时，在北店村附近突然遭到吴嘉模部的包围。朱程在部下掩护下突出重围，同行的原民军第十大队政治部主任却被捉住遭活埋。这就是张荫梧阴谋制造的“北店事件”。

“北店事件”后，朱程决意脱离河北民军，便率第四团经五昼夜的急行军，到达山西省昔阳县，后又转到襄垣县。在全团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

大会上，他揭露了张荫梧积极反共、破坏抗战、排除异己、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的罪行，并通电全国，宣布第四团正式脱离河北民军。

7月中旬，朱程派政治部主任殷震夏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部队脱离国民党顽固派的经过。下旬，他接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写的回信，信中说：“获悉贵部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经过与目前状况，均极进步，有生气，至为佩慰。”回信还对朱程的工作作了指示，指出：“目前主要是进行巩固部队工作，加强军事政治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有坚固之政治基础，发展方易。”并表示希望“吾兄能来本部晤谈一次”。朱德、彭德怀的亲笔信给了朱程极大的鼓舞。8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民军四团改编为华北抗日民军，朱程任司令员，闻允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程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北抗日民军编成后，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进行了整军，部队官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0月，为了打击白晋公路上的夏店日军据点，朱程经过精心部署，组织了狮山伏击战。战前，他亲自带领

二连连长孙祖涵，化装成老百姓，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详细地侦察白晋公路沿途的地形、地物及日军的兵力部署、活动规律等。然后又与孙祖涵一起化装成去北山进香的香客，察看设伏的地点。在朱程的严密部署和亲自指挥下，民军在狮山一举消灭日军100余人，击毁满载军火和军需品的汽车11辆，缴枪80余支。此战告捷，使华北抗日民军的名声大振，传遍晋东南一带。

1940年春节前，华北抗日民军进驻豫北林县。附近九峰山上有国民党第二战区董良俭部第八支队约2000人占山扎寨，专事派粮派款、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却不打日军，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称董部为“土匪部队”。朱程率部到达林县后，当地群众立即派代表找他，揭露董部的种种罪恶，要求消灭这支部队。朱程考虑到九峰山地形险要，董良俭的兵力又超过民军，决定智取九峰山。

春节前两天，天降大雪，朱程趁董部忙于过节、防备松懈之机，率部奔袭九峰山。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当地向导引路，绕过董部设防的卡口，从只有当地放羊人才知道的险峻小道攀上九峰山制高点，袭取了王莽岭、石板河；然后，居高临下，猛攻

张沟、柳树崖等董部据点，占领了老爷顶下的梯口，堵住了顽敌逃跑之路；另一路攻入九峰山暖璋阁，活捉了董良俭。激战两天一夜，全歼了顽军第八支队，缴枪千余支，俘千余人，而民军无一伤亡，表现了朱程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仗，不仅为当地人民除了大害，解放了方圆五十多里的三十余个村庄，打开了民军从陵川东进平汉铁路的通道。

1940年4月，华北抗日民军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和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朱程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从1940年5月到1943年5月这三年中，朱程率领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及分区所属部队，经大小战斗百余次，胜利地开辟了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他率领华北抗日民军第一团，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拔除了内黄县的西马上、阳邵集、魏流河等敌伪据点，消灭伪军400余人。4月12日，在日伪军的“大扫荡”中，朱程率少数战斗部队，掩护沙区党政机关干部和群众2000余人胜利突围。1942年夏，他指挥的内黄县东庄战斗，又消灭敌第一路军李英部百余人，击毙敌旅长唐海廷。敌军闻风丧胆，竟两个月不敢出寨门。

1943年夏，朱程调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8月下旬，遵照军区指示，他率华北抗日民军第一团和第二十团等部，由山东省曹县以西抗日根据地进入曹县东南日伪顽控制区一带活动，开辟新区。

是年9月上旬，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步兵第十二军混成第十旅团各一部3000余人，从砀山、成武、单县、曹县等地出发，向根据地进攻。朱程指挥民军第一、第二十团等部，在曹县东南积极活动，以牵制敌人。9月28日上午7时，朱程率部在王厂村北面约一公里的大堤下集结，正准备转移时，突然出现敌情。为避开日军合击，他命令部队迅速向根据地边缘靠近。由于敌人来势迅猛，除第一团的第一、二、三、五连大部突围外，朱程和军分区机关、第一团指挥所以及骑兵连都被敌包围。为保全全连马匹，朱程命令骑兵连设法先行突围。他带领留下的100余人和4挺机枪，与敌周旋，再伺机突围。他们决定先抢占王厂村，但当部队冲近王厂村时，发现敌已先占据村庄，控制了民房制高点，以机枪封锁进村通道。朱程命令冲在前面的部队集中火力，消灭敌机枪火力点。经过顽强的反击，部队终于抢占了村边的一座土墙围子。此时部队

已被日军包围，情势十分危急。朱程及第一团政委魏明伦与战士们一起宣誓：“誓死坚守阵地，誓死不当俘虏，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开始抢挖工事。

8时半，日军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发起进攻。为了节省子弹，朱程下令等敌人冲到土墙前30米时才射击。在战士们的英勇抗击下，日军陈尸累累。有一次，有十几个敌人爬上土墙，都被战士用刺刀捅死。12时，敌人施放了两枚毒瓦斯弹，因院内无水，大家只好用撒上尿的毛巾掩住鼻子，坚持战斗。一个上午就击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下午1时，敌人从三面发动更猛烈、疯狂的进攻。有些敌兵已越过土墙，进入院内，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有的刺刀戳弯了，就用枪托打，终于消灭了突入院内的日军。敌人伤亡惨重，而战士们也已伤亡过半，只剩下30余人。3时，朱程将这30余人编成4个班，准备再坚持1个多小时就突围。不料，敌人因多次进攻不能得逞，怕天黑后更难对付。4时许，就用炮击，结果南面土墙被轰塌一段，战士又伤亡1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朱程只好带领战士突围，结果不幸于突围中壮烈牺牲。

王厂一战，使日军丧胆。一个

日军战地记者记述了“王厂战斗”之惨烈，称“朱程决死指挥”“必死抵抗”“不见降服的样子”，日军进攻时，王厂已“犹如地狱”。

朱程壮烈殉国的噩耗传来，曹西根据地军民无不悲痛万分，原五分区指战员“痛哭废食者数百十人”。1943年11月18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致悼词，说：“噩耗传来，精神上顿觉如有所失，历时逾月，仍萦怀未已。”又说：“朱程同志的牺牲，是我中华民族失一将才，边区部队失却了一个良好的指挥员，我党损失了

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朱程烈士，这位华北抗日民军主要创建人、驰骋沙场的铁军将才，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他所献身的正义事业是永存的，他的闪光名字和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2014年，朱程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柑儿文”是什么文？

◇ 金益丰

瓯柑，自古是瓯越名果，民间素有“端午瓯柑赛羚羊”之说。吃过瓯柑的人都知道，瓯柑入口，初觉甜味中略带淡淡的苦涩和酸辛，但转口间，就有一股股清爽甘醇涌上舌尖，十分可口，百吃不厌，故温州人对瓯柑情有独钟。但对于瓯柑衍生出来的“柑儿文”，很多人却不甚了解。要把瓯柑和“柑儿文”搞明白，有一个人绕不开，他就是韩彦直。

韩彦直，字子温，陕西人。南宋淳熙四年（1177），韩彦直调任温州知州。在温州的近三年时间，为温州百姓及后人做了两件影响至今的好事：一是疏浚城内及环城河道；二是编著《永嘉橘录》农书。

温州有悠久的柑橘种植史。据三国吴沈莹《临海异物志》载：“鸡桔子，大如指，味甘，永宁界中有之。”三国时，温州一带属于临海郡的永宁县，可见距今1700余年前，温州的金橘已很著名了。唐宋时，温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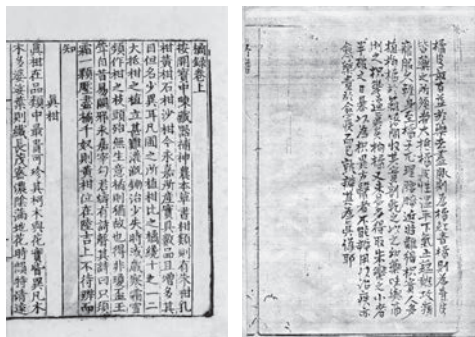
瓯柑以质优味美誉冠全国，成为帝王元宵佳节分赐群臣的果品。《新唐书·地理志》载，瓯柑和甘蔗、土布、鲛革等早在唐朝就列为朝廷贡品。

韩彦直花费两年的时间亲自作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写出的这部书，书中列橘类14个品种，柑类（橘类的别种）8个品种，橙类5个品种，共计27个品种，并列举各个品种的特征。

《永嘉橘录》推动了温州柑橘的发展，种植经验传承至今，它不但为温州柑橘这一特产提供珍贵史料，也是世界最早的柑橘专著。

而其中“黄柑”就是今天的瓯柑。瓯柑原产地在三垟、茶山、梧田等地，如今，瓯柑已成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瓯海是“中国瓯柑之乡”。

“柑儿文”是温州方言，“柑儿”是指小瓯柑、“文”有死亡的意思，“柑儿文”顾名思义就是夭折的



《永嘉橘录》



晒制柑儿文

瓯柑幼果；“柑儿文”的中药名叫“青皮”，《中国药典》记载：“青皮”为芸香科柑橘属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其味苦、辛，性温，有疏肝破气，消积化滞功效，用于胸胁胀痛，疝气疼痛，乳癖，乳痛，食积气滞，脘腹胀痛。

“青皮”单独为一药始载于金代张元素《珍珠囊》一书：“味苦、辛、温，归肝、胆、胃经。青橘皮气味俱浓，沉而降，阴也。”

在韩彦直的《永嘉橘录》有：“橘皮最有益于药，去尽脉则为橘红，青橘则为“青皮”，皆药之所须者。”从南宋开始正式将青橘改称为“青皮”。《永嘉橘录》成书于公元1178年，见证了“柑儿文”在温州至少已有800多年的晒制入药历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载有“青皮”治疗乳痛的单方：因久积忧郁，乳房内有核如指头，不痛不痒，五七年成痈；用“青皮”四钱，水一盞半，煎一盞，徐徐服之，日一服。

瓯柑幼果晒干后统称为“柑儿文”，如黄豆般大小的又称为“青皮子”，玻璃弹珠大小则谓之“个青皮”。一般5公斤左右鲜果可晒1公斤。晒制方法也颇有讲究，瓯柑幼果要先清洗掉泥巴，在阳光下暴晒5—7天，此时果皮由青转黑变硬，再装在麻袋或蛇皮袋里捂上两天，让瓯柑幼果里面的水份渗透散发到果皮后再晒。如此反复3—4次，晒制的干果触感如核桃般坚硬，可闻到一股药香味。经过密封保存的“柑儿文”，可以存放很久，而且时间越久，香气越浓，其药效也越好。

“柑儿文”不仅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也承载着温州人的儿时记忆。

(下转第97页)

瓯居海中 瓯容四海

◇ 温州市瓯海区地方志研究室

瓯海是温州市四个区之一，因《山海经》有“瓯居海中”的记载而得名。1981年12月，瓯海从温州市郊区析出，设置瓯海县，1992年3月撤县设区。全区国土面积466平方公里，下辖12个街道、1个镇、温州高教园区和瓯海经济技术开发区。2020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46.82万人，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中国科技工作先进区、中国营商环境百佳示范县（区）。

瓯海区处于温州市区的西南部，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南亢北卑。陆地占93.33%，水域占6.67%。林业用地面积37.6万亩，耕地面积12万亩。境内有温瑞塘河和汇昌湖两大水系，大小河流152条，主河道17.27公里。温瑞塘河位于瓯江以南、飞云江以北

的温瑞平原，分属于鹿城、瓯海、龙湾、瑞安等“三区一市”管辖。瓯海区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域，全年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瓯海产业特色较为明显，轻工业基础扎实。瓯海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温州模式”的重要贡献者，创办了全省第一个米市、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拥有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智能锁生产基地等四张“国字号”制造业名片和生命健康小镇、时尚智造小镇两大省级特色小镇。有规上工业企业



铁路温州南站（管新民/摄）



温州高教园区



亚运公园

(朱展立/摄)

业635家，市场主体超过10万户，形成了服装、眼镜、锁具、鞋革、汽摩配、电气机械、包装、食品八大传统优势产业，其产值占全区经济总量的80%。其中服装、眼镜、锁具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有“世界眼镜看中国，中国眼镜看瓯海”之说。

瓯海区位优势明显，东接龙湾区，南连瑞安市，西接丽水青田县，北邻鹿城区。作为温州城市对外的主窗口，交通便利发达，境内有铁路温州南站、四个高速出口，甬台温等三条铁路交汇于此，全市唯一的高架桥——瓯海大道横贯瓯海区东西方

向，与联通温州南北的主干道温瑞大道相交在瓯海。瓯海借助区位优势，推进华润万象城、大西洋银泰城、西江月印象里等引领型项目相继投用，落地了浙南第一高楼、亚运龙舟赛事基地等一批地标建筑，刷新了温州城市版图和天际线，先后被评为“浙江省最具发展潜力十大新城”“浙江产城融合十大示范新城”。

作为浙江省三大科技大走廊之一——环大罗山科技走廊主阵地，瓯海下辖温州高教园区，拥有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等三个“国字号”创新平台，温州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九所本地高校，拥有加拿大“两院”院士陈忠伟、温州医科大学李校堃院士、宋伟宏院士等一批领军型人才，是目前浙南闽北赣东地区人才最集聚、平台最高端的区域。瓯海人力资源相对活跃，是革命老区，又是知名侨乡，分布在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2万海外侨胞，为瓯海走向世界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瓯海山水风光得天独厚，景区面积占全区面积的41%。作为“瓯越文化”的精华所在，瓯海区是温州母亲山——大罗山、母亲河——温瑞塘河的主体所在，出土有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墓，保留有国内唯一传承古法造

纸技术的泽雅“四连碓”，涌现了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永嘉学派代表陈傅良、佛学大师李叔同、散文大家朱自清、华人文坛恒星琦君等一大批文化

名人，《梅雨潭的绿》《橘子红了》等名篇佳作在这里流传，共同承载起了大罗山文化、纸山文化、塘河文化“两山一水”的独特地域文化。

(上接第94页)

每年的5—6月份，正是瓯柑的生理落果期，在温州人的记忆里，年幼时经常去瓯柑园里将这些掉落的瓯柑幼果捡起来送给老香山、叶同仁等药房收购。也有将瓯柑幼果带回家晒干成为“柑儿文”，以备积食及伤风不时之需，而此“伤风”非感冒伤风，乃指旧时温州民间家家户户喜欢盛饭到院子与左邻右舍边吃边闲聊，此时如若风大，极易将风“吃”到肚子里引起腹胀肚痛，称为伤风，“柑儿文”煮水喝即可缓解。另外，它对积食及小儿疝气有特效。在过去，温州人还偏爱用“柑儿文”泡茶来助积食消化。

如今的“柑儿文”已不再仅限于药用，而以更多的形态和方式融入温州人的生活。本土企业通过挖掘、传承其历史文化、药用价值，创新性的把“柑儿文”加入时尚元素相继开发

成为养生保健茶，日常饮用，可以调理肠胃；作为炖品佐料，有去腥、增加香味的作用；制作成香囊，可提神醒脑；利用温州方言“橘”与“吉”谐音，开发成为温州特产伴手礼，凸显大吉大利寓意。

先苦后甜堪品味，温州精神代代传。“柑儿文”初食微苦，回味甘甜，品“柑儿文”犹如品读温州人精神：吃苦耐劳、先苦后甜！“柑儿文”是承载着瓯越文化的一个符号，“柑儿文”更是勾起思乡情结的载体，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温州人偶有出现水土不服，取几颗“柑儿文”煮水喝便可缓解不适，客居他乡的温州人，“柑儿文”的那一丝苦味，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牵挂。

(作者单位：瓯柑非遗馆)

赵师秀《约客》赏析

◇ 饶晟吉

约客

南宋·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号灵秀，又号天乐，浙江温州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但仕途不佳，一生浮沉于州县，后辞官归乡。他曾自言：“官是三年满，身无一事忙。”由此看来，做官并不是其志向所在。“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在《赠赵师秀》中写道：“游宦归来隔几春，清羸还是旧时身。”倒是归隐江湖，与诸友唱酬赠答，访寺拜僧，志情当下，追求诗意生活，才可以让赵师秀感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赵师秀是“永嘉四灵”中成就最高的一位，留有《清苑斋集》传

世。“永嘉四灵”是南宋后期的一个重要流派，因不满“江西派”诗风而产生，他们师法晚唐，以贾岛、姚和为尊。晚唐诗人多致力于五言、七言律诗，有“只出佳句而无名篇”的通病。但赵师秀的五言、七言诗作大多数有句有篇，浑然天成、立意高远，寄托遥深，没有贾、姚的苦吟痕迹，也没有晚唐诗人只有佳句而无名篇的通病。其《约客》就是一篇通俗易懂、毫无斧凿之迹的佳作，是备受后世推崇的一首诗。

《约客》一诗简短、质朴，前两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以赋入诗、对仗自然，写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意向，既点明时令，也交待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江南的初夏时节，黄梅时节到处下雨，池塘里随处可以听见蛙鸣。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点题，表明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于是

有了第四句“闲敲棋子落灯花”，诗人独自一人悠闲地在棋盘上摆棋子，看到油灯中灯花掉下来。此诗每一句分开看都通俗易懂，连在一起又充满诗意，耐人寻味。

《宋诗鉴赏词典》中认为“蛙声喧聒盈耳，一灯如豆，枯坐敲棋”，恰与前文构成鲜明对照，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落寂失望的情怀。语文教学的《大纲》中也认为，这首诗描写了诗人雨夜候客来访，客人不至，表达了诗人约客未至的惆怅心情。上述的理解，大约是将梅雨、蛙声与潮湿、聒噪的不适感联系在一起而得出的结论，笔者倒不这么认为。

《约客》一诗基调平和甚至有点欢快，毫无惆怅烦闷之意。前两句，“家家雨”和“处处蛙”，其意象组合虽然简约，却能立即在读者眼前勾勒出一幅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水乡初夏时的景色，而把叠词“家家”“处处”放在诗行同一位置上，又能互相照应，增加了语言的听觉美感，更突出了户外与野外的热闹。且蛙声作为诗词意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辛弃疾《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陆游《幽居初夏》：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薄

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等等，无不表现的是词人的喜悦之情。

此外，我们再看诗人约客是为了干什么呢？不是把酒言欢，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这一需要充分闲情逸致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朋友失约定是被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的难处，绝不会责怪于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案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案，可诗人仍意犹未尽。而体现出这些的正是第四句中的一个“闲”字。“闲”字构成了全诗的点睛之笔，炼活了整首诗，也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诗人静敲棋子，看着落下的灯花，友人的不至反而为诗人提供了让思绪漫天飞舞的机缘。在诗人的思绪中，有自然万物之美景，有自由广阔之神思，诗人陶醉于窗外之景并融入其中，其心灵于一刹那间寻到了独乐之乐。

有学者将《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相比较：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同样，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体验中有着启承转合的内在关系，所为文事的内心世界也惊人的相似。正如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过程，此时此景，应是“想花之心比见花要深”，别有一种充满禅意的美。池塘边的青草因为雨水而湿漉漉的，水面上漾起薄薄的水汽，蛙声清脆悠远，万物生生不息，生命快感直入诗人的心间，瞬间体验到生命之乐感、生活之乐趣。

“永嘉四灵”的大部分诗篇写景抒情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生活气息较浓，摆脱雕琢之习，清丽可诵，特别适合表达一部分文人的“闲情”。叶适就对“四灵”诗歌评价颇高，赞许“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宋诗中很少有功利性的情感，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正如赵师秀的《约客》，不是写重大题材，而是在一片娴静之中展示出了诗人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后人虽不好从思想内容上去评判其文学价值，但值得肯定的是，此诗在文学艺术的体现上是非常成熟出色的。

（作者单位：温州市国资委）